

中国青年



1959 ZHONGGUO QINGNIAN



①1919年4月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大学等校学生于5月4日齐集在天安门前示威游行。



②消息传到天津，天津学生立即响应北京的爱国运动，很快地组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并编印「学生联合会报」《醒世周刊》作排斥日货的宣传。

天津美术出版社供稿



③北京政府在6月3日又逮捕了大批学生，天津学生为了声援北京学生，向省长公署请愿时，突遭到军警包围。



④天津学生结队来到总商会要求商会响应声市，声援北京被捕学生，天津学生联合会又推马毅等10人会向北京学联会代表去总统府请愿，徐世昌只靠众压力很大，只得答应马上给巴黎打电报拒签和约。



⑤警察将学生大队的领导人马毅抓起来，但在群众压力下，还是把他释放了。



也在天津蓬勃地发展起来了。

五四时期的天津青年

俞沙丁画



毛主席和我們一起劳动

王式廓作

1959年第九期
1959年5月1日出版
总第217期
(半月刊)

毛主席論青年和青年工作本刊編輯部 (2)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轉变 吳玉章 (10)

五月的历史性号召 邓拓 (16)

西藏, 永远是我們的西藏 鍾青 (19)

談1959年国民經济计划的几个問題 未易 (23)

湘江的怒吼 周世釗 (26)

——“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跟随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呂振羽, 江明 (31)

医务工作者和病人之間 傅連璋 (35)

光荣归于党和祖国 容国团 (37)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大家談) (39)

——学习向秀丽要解决的一个根本問題

舍己救人的廖灿貴 林伯余 (40)

新語林: 聰明的姑娘 (阿富汗童話) 朱丹譯 (18)

插頁: 毛主席和我們一起劳动 王式廓

封面: 沿着“五四”的道路前进: 于化

封二: “五四”时期的天津青年 (組画) 俞沙丁

封三: “五四”紀念歌 王戈情詞, 时乐蒙曲

封底: 繼承“五四”革命傳統, 成为社会主义建設尖兵 尹致生

編輯者: 中国青年社 正文印刷者: 中国青年、少年报印刷厂

社址: 北京御河桥3号 封面印刷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

电话: (5) 2632轉099 总發行处: 邮电部北京邮局

出版者: 中国青年出版社 訂購处: 全国各地邮局

社址: 北京老君堂11号 代售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电话: (4) 4761号 定价: 每册0.16元

上期印数: 1,522,510

代号: 2—39



毛主席論青年和青年工作

本刊編輯部

我們的黨和毛主席一貫重視青年在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中的作用，十分關懷青年運動的發展和青年一代的成長。毛主席關於青年問題和青年工作的許多深刻而寶貴的論述和指示，是我國青年運動蓬勃發展和青年一代健康成長的重要指針。在紀念“五四”四十周年這個光榮節日的時候，我們特將毛主席有關青年和青年工作的言論和指示的一部分彙錄發表。

為了閱讀方便起見，我們權把這些言論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論述中國青年和中國青年運動在中國革命鬥爭和建設事業中的作用。第二部分是論述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和青年團的工作。第三部分是對青年的教導和勉勵。在這三部分中，有些言論含有多方面的內容，讀者應該充分地理解它的豐富意義。

目前，我國正處在一個歷史上空前偉大的飛躍發展的時代。我們這一代青年的歷史使命，就是要和全國人民一道，為建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奮鬥。因此，我國青年和青年工作者深入地學習毛主席的有關青年和青年運動的重要言論，有著重要意義。我們希望全國青年和青年工作者們都能認真地領會這些指示和教導，以改進工作和提高覺悟。

(一)

毛主席非常重視青年和青年運動在我國革命事業中的作用。一九三九年五月，毛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一文中，指出中國青年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中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

“五四”以來，中國青年們起了什麼作用呢？起了某種先鋒隊的作用，這是全國除開頑固分子以外，一切的人都承認的。什麼叫做先鋒隊的作用？就是帶頭作用，就是站在革命隊伍的前頭。中國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隊伍中，有由中國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組成的一支軍隊。這支軍隊是相當的大，死了的不算，在目前就有幾百萬。這支幾百萬人的軍隊，是反帝反封建的一個方面軍，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方面軍。”

一九三九年五月，毛主席在“五四運動”一文中說：

“二十年前的五四運動，表現中國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階段。

五四运动的成为文化革新运动,不过是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那个时期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一个壮大了的阵营,这就是中国的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的民族资产阶级所组成的阵营。而在‘五四’时期,英勇地出现于运动先头的则有数十万的学生。这是五四运动比较辛亥革命进了一步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又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有很大的革命性:

“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并不是一个阶级或阶层。但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看,从他们的生活条件看,从他们的政治立场看,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多数是可以归入小资产阶级范畴的。数十年来,中国已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知识分子群和青年学生群。在这一群人中间,除去一部分接近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并为其服务而反对民众的知识分子外,一般地是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压迫,遭受着失业和失学的威胁。因此,他们有很大的革命性。他们或多或少地有了资本主义的科学知识,富于政治感觉,他们在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中常常起着先锋的和桥梁的作用。辛亥革命前的留学生运动,一九一九年的五四运动,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一九三五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显明的例证。尤其是广大的比较贫苦的知识分子,能够和工农一道,参加和拥护革命。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中国的广大的传播和接受,首先也是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革命力量的组织和革命事业的建设,离开革命的知识分子的参加,是不能成功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在延安各校学生及青年团体召开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四周年纪念大会上,毛主席指出一二·九运动的重大历史意义:

“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推动了‘七七’抗战,准备了‘七七’抗战。当五四运动以后,到五卅运动,中国成了一个全民的运动,全国各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这个时期,五四运动准备了舆论,准备了干部,准备了思想和准备了人心,到后来才有一九二五——二七的大革命。”

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西北之时,这说明一二·九学生运动与红军北上抗日两件事的结合,这两件事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中共中央在‘八一’宣言之后,号召全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动了全国的团结抗战,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于‘八一’宣言之后,他们反对当时对青年的压迫,他们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他们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个运动的发动,轟动了全国,一二·九运动将为历史上一个大的纪念。”

一九三九年十月,毛主席在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的题词中还指出:

“带着新鲜血液与朝气加入革命队伍的青年们,无论他们是共产党员或非党员,都是可贵的,没有他们,革命队伍就不能发展,革命就不能胜利。但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而革命经验是必须亲身参加革命斗争,从最下层工作做起,切实地不带一点虚伪地经过若干年之后,经验就属于没有经验的人们了!”

对我国青年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毛主席也非常重视。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说:

“工农青年、知识青年和部队中的青年,他们英勇积极,很有纪律,没有他们,革命事业

和建設事業就不能勝利。”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為“中山縣新平鄉第九農業生產合作社的青年突擊隊”一文加按語，又強調指出：

“青年是整個社會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積極最有生氣的力量。他們最肯學習，最少保守思想，在社會主義時代尤其是這樣。希望各地的黨組織，協同青年團組織，注意研究如何特別發揮青年人的力量，不要將他們一般看待，抹殺了他們的特点。”

對於青年，毛主席寄予了極大的期望。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七日，毛主席在蘇聯向莫斯科的中國留學生、實習生講話中說：

“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是歸根結底是你們的。你們青年人朝氣蓬勃，正在興旺時期，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希望寄托在你們身上。”

“世界是屬於你們的。中國的前途是屬於你們的。”

(二)

毛主席在各個革命時期，都對青年運動和青年工作作了重要的指示。

毛主席經常教導青年要加強團結，團結起來為革命而鬥爭。一九三九年五月在“青年運動的方向”里，毛主席指出：

“希望大家把五十年來的中國革命經驗研究一下，把好的地方發揮起來，把錯誤去掉，使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結合起來，使革命由失敗轉變到勝利。到了全國青年和全國人民都發動起來、組織起來、團結起來的一天，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的一天。每個青年都要擔負這個責任。每個青年現在必須和過去不同，一定要下一個大決心，把全國的青年團結起來，把全國的人民組織起來，一定要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倒，一定要把舊中國改造為新中國。這就是我所希望於你們的。”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主席在接見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代表時，號召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與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錯誤言行作鬥爭：

“你們的會議開得很好。希望你們團結起來，作為全國青年的領導核心。中國共產黨是全國人民的領導核心。沒有這樣一個核心，社會主義事業就不能勝利。

你們這個會議是一個團結的會議，對全國青年會有很大的影響。我對你們表示祝賀。

同志們，團結起來，堅決地勇敢地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奮鬥。一切離開社會主義的言論行動是完全錯誤的。”

毛主席對中國青年運動的方向作了重要指示。一九三五年，毛主席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里說：

“學生運動已有極大的發展，將來一定還要有更大的發展。但學生運動要得到持久性，要沖破美國賊的戒嚴令，警察、偵探、學棍、法西斯蒂的破壞和屠殺政策，只有和工人、農民、兵士的鬥爭配合起來，才有可能。”

一九三七年春，毛主席在和北方青年的談話中指出，青年運動必須與全民的革命運動相結合：

“北方青年為民族解放鬥爭的先鋒，他們的大多數，應該團結，為民族民主革命鬥爭到底。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对時局煩悶，這應在集體的運動中求解決，這個運動就是為求民主與抗日實現的鬥爭。北方青年應該對爭取民主自由增加興趣，爭取愛國的民主自由，是今天政治生活中心之一。如若干人只談抗日，而不知作實際的民主政治的鬥爭，則抗日是不会有效果的。資產階級的改良主義，正向北方青年發生影響，企圖把他們從前線拉到後方，從奮起中拉到平凡安靜，從

領導地位拉到尾巴主義，撲滅北方青年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領導作用，北方青年應該同這種改良主義者作鬥爭。對改良主義者的傾向和影響應該加以嚴格檢查和完全克服。”

毛主席經常強調革命知識青年要和工农群眾相結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九日，毛主席在延安各校學生及青年團體召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四周年紀念大會上講話說：

“自五四運動起，共產黨就與知識分子結合在一起，一二·九運動中，共產黨起了骨幹的作用。這些說明知識分子要與共產黨結合，要與廣大的工农群眾結合，要與革命武裝隊伍結合，要與八路軍新四軍結合。共產黨非常歡迎知識分子，反對的是那少數壞知識分子。現在很多青年知識分子沒有自由，沒有走路之權，知識分子一定要與革命軍隊結合起來，筆與槍合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抗戰勝利，建立一個民主共和國出來！”

一九三九年五月，毛主席在“青年運動的方向”里指出全國知識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农群眾結合在一起，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

“中國的知識青年們和學生青年們，一定要到工农群眾中去，把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眾，動員起來，組織起來。沒有工农這個主力軍，單靠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這支軍隊，要達到反帝反封建的勝利，是做不到的。所以全國知識青年和學生青年一定要和廣大的工农群眾結合在一塊，和他們變成一體，才能形成一支強有力的軍隊。這是一支幾萬萬人的軍隊呵！有了這支大軍，才能攻破敵人的堅固障地，才能攻破敵人的最後堡壘。拿這個觀點來看過去的青年運動，就應該指出一種錯誤的傾向，這就是在過去幾十年的青年運動中，有一部分青年，他們不願意和工农大眾相聯合，他們反對工农運動，這是青年運動潮流中的一股逆流。他們實在太不高明，跟占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眾不聯合，並且根本反對工农。這樣一個潮流好不好呢？我看是不好的，因為他們反對工农，就是反對革命，所以說，它是青年運動中的一股逆流。這樣的青年運動，是沒有好結果的。”

“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就是全國的青年運動的方向。為什麼？因為延安的青年運動的方向是正確的。……延安的青年們不但本身團結，而且和工农群眾相結合，這一點更加是全國的模範。延安的青年們干了些什麼呢？他們在學習革命的理論，研究抗日救國的道理和方法。他們在實行生產運動，開發了千畝萬畝的荒地。開荒種地這件事，連孔子也沒有做過。孔子辦學校的時候，他的學生也不少，‘賢人七十，弟子三千’，可謂盛矣。但是他的學生比起延安來就少得多，而且不喜歡什麼生產運動。他的學生向他請教如何耕田，他就說：‘不知道，我不如農民。’又問如何種菜，他又說：‘不知道，我不如種菜的。’中國古代在聖人那裏讀書的青年們，不但沒有學過革命的理論，而且不實行勞動。現在全國廣大地方的學校，革命理論不多，生產運動也不講。只有我們延安和各敵後抗日根據地的青年們根本不同，他們真是抗日救國的先鋒，因為他們的政治方向是正確的，工作方法也是正確的。所以我說，延安的青年運動是全國青年運動的模範。”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里指出：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知識分子的動搖性：

“知識分子在其末和民眾的革命鬥爭打成一片，在其末下決心為民眾利益服務並與群眾相結合的時候，往往帶有主觀主義和個人主義的傾向，他們的思想往往是空虛的，他們的行動往往是動搖的。因此，中國的廣大的革命知識分子雖然有先鋒的和橋樑的作用，但不是所有這些知識分子都能革命到底的。其中一部分，到了革命的緊急關頭，就會脫離革命隊伍，採取消極態度；其中少數人，就會變成革命的敵人。知識分子的這種缺點，只有在長期的群眾鬥爭中才能克服。”

“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农民眾相結合。”這

个著名的論断是毛主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紀念五四运动二十周年所写的“五四运动”一文里向青年提出的：

“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都明显地表现了这一点，而五四运动时期的知識分子则比辛亥革命时期的知識分子更广大和更觉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結合，則將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他們的最后分界仅仅在这一点，而不在乎口講什么三民主义或馬克思主义。真正的革命者必定是願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結合的。”

一九三九年五月，毛主席在延安青年群众的五四运动二十周年紀念会上，又說：

“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拿什么作标准呢？拿什么去辨别他呢？只有一个标准，这就是看他願意不願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同广大的工农群众結合在一塊。願意并实行与工农結合的是革命的，否則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他今天把他自己結合于工农群众，他今天是革命的，但如果他明天不去結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了。有些青年仅仅在嘴上大講其信仰三民主义，或信仰馬克思主义，这是不算数的。你們看，希特勒不是也講‘信仰社会主义’嗎？莫索里尼在二十年前还确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呢！他的‘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原来就是杀人不见血的法西斯主义！陈独秀不是也‘信仰’过馬克思主义嗎？后来干了什么呢？原来是跑到反革命那里去了。張国燾不是也‘信仰’过馬克思主义嗎？他现在到那里去了呢？原来一小差就开到泥坑里去了。有些人自己对自己加封为‘三民主义信徒’，而且是老牌三民主义者，可是他們做了些什么呢？原来他們的民族主义，就是勾結帝国主义；他們的民权主义，就是压迫老百姓；他們的民主主义呢？那就是把老百姓身上的膏血，吸得越多越好。这是口是心非的假三民主义者，汪精衛就是这些人的总代表。所以我們看人的时候，看他是一个假三民主义者？还是一个真三民主义者？一个假馬克思主义者呢？还是一个真馬克思主义者？只要看他同广大工农群众的关系如何，就完全清楚了。只有这一个辨别的标准，沒有第二个标准。我望全国青年切記不要墮入那股黑暗的逆流之中，要認清工农是自己的朋友，向光明的前途进军。”

一九四五年四月，毛主席在“論联合政府”里号召革命知識分子热情地到农村中去：

“中国广大的革命知識分子應該觉悟到将自己和农民結合起来的必要。农民正需要他們，等待他們的援助。他們應該热情地跑到农村中去，脱下学生装，穿起粗布衣，不惜从任何小事情做起，在那里了解农民的要求，帮助农民觉悟起来，組織起来，为着完成中国民主革命中一項極其重要的工作，即农村民主革命而奋斗。”

革命胜利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为“在一个乡里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經驗”一文中加按語，又說：

“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識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毛主席对共青团的工作是極其关怀和重視的。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在接見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对建設时期的青年工作作了極其重要的指示：

“青年团在党的领导下，动员了上几百万青年团员并团結了全国青年，配合了党的中心工作，成績很大。”

“现在社会的民主改革已經完成，新的建設时期开始了。青年团除了应繼續配合党的中心工作以外，还要有适合青年特点的独立工作。新中国要为青年們着想，要关怀青年一代的成长。青年們要学习，要工作，但青年时期是长身体的时期。因此，要充分兼顧青年的工作、学习和娛

乐、体育、休息两个方面。”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说，青年团应该管思想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各个部门都要负责。共产党应该管，青年团应该管，政府主管部门应该管，学校的校长教师更应该管。”

对于建团整团和基层团的工作，毛主席也给予了重要的指示。一九五五年七月，毛主席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报告中说：

“建设和整社工作都要依靠党和青年团的乡支部。因此，建社工作和整社工作都要同在乡村中的建党建团工作和整党整团工作密切地相结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为“必须向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重的斗争”一文加按语说：

“合作社应当设立监察委员会，负责检查合作社的账目，对于干部的贪污盗窃行为进行严重的斗争。党和团的支部应当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为“一个受欢迎的农业技术夜校”一文加按语，指出青年团要管好青年的技术学习：

“这样的技术夜校，每个乡，在目前至少是大多数的乡，都应当办起来，青年团的各级组织应当管这件事。农民的学习技术，应当同消灭文盲相结合，由青年团负责一同管起来。技术夜校的教员，可以就地选拔，并且要提倡边教边学。”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为“莒南县高家柳沟村青年团支部创办记工学习班的经验”一文加按语，指出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青年的文化学习：

“这个经验应当普遍推行。列宁说过：‘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内，是建成不了共产主义社会的。’我国现在文盲这样多，而社会主义的建设又不能等到消灭了文盲以后才开始进行，这就产生了一个尖锐的矛盾。现在我国不仅有许许多多到了学习年龄的儿童没有学校可进，而且还有大批超过学龄的少年和青年也没有学校可进，成年人更不待说了。这个严重的问题必须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加以解决，也只有在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才能解决。农民组织了合作社，因为经济上的需要，迫切地要求学文化。农民组织了合作社，有了集体的力量，情况就完全改变了，他们可以自己组织学文化。”

“山东莒南县高家柳沟村的青年团支部做了一个创造性的工作。看了这种情况，令人十分高兴。教员是有的，就是本乡的高小毕业生。进度是快的，两个半月就有一百多个青年和壮年学会了两百多字，能记自己的工账，有些人当了合作社的记账员。记工学习班这个名称也很好。这种学习班，各地应当普遍地仿办。各级青年团组织应当领导这一工作，一切党政机关应当予以支持。”

(三)

青年们要想在革命事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必须具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必须努力提高思想觉悟，“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里，向青年指出了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在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间，最近一个时期，思想工作减弱了，出现了一些偏向。在一些人的眼中，好像什么政治，什么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都没有关心的必要。好像马克思主义行时了一阵，现在就不那么行时了。针对着这种情况，现在需要加强思想工作。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

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

青年們由于缺乏政治經驗和社会生活經驗，往往对革命和建設事业中的困难估計不足，对某些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和容易，没有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毛主席针对青年这种情况教导青年要勇于克服困难，要用辛勤劳动把我国建設成一个富强的国家。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論中說：

“要提倡勤儉建国。要使全体青年們懂得，我們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時間內，团結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創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給我們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們的辛勤劳动。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費气力享受現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應該承認：有些群众往往容易注意当前的、局部的、个人的利益，而不了解或者不很了解长远的、全国性的、集体的利益。不少青年人由于缺少政治經驗和社会生活經驗，不善于把旧中国和新中国加以比較，不容易深切了解我国人民曾經怎样经历千辛万苦的斗争才摆脱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压迫，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要经过怎样的长时间的艰苦劳动。因此，需要在群众中間經常进行生动的、切实的政治教育，并且应当經常把發生的困难向他們作真实的說明，和他們一起研究如何解决困难的办法。”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在苏联向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實習生講話中告訴青年，世界上最怕“認真”二字，勸勉青年做事要認真：

“真正的徹底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成功的。在我国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有人認為在一九五六年，我看实际上是一九五七年。一九五六年改变了生产资料的所有制，这还是比较容易的；一九五七年才在政治上、思想上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現在右派是打垮了。但是我們工作中的缺点还是有的，所以要整風。这次整風是件很大的事，我們要認真地改。世界上怕就怕“認真”二字，共产党就是講“認真”。”

一九四四年，毛主席在“學習和时局”中要求青年不要背上包袱，驕傲自大：

“为了爭取新的胜利，要在党的干部中間提倡放下包袱和开动机器。所謂放下包袱，就是說，我們精神上的許多負担應該加以解除。有許多的东西，只要我們对它們陷入盲目性，缺乏自覺性，就可能成为我們的包袱，成为我們的負担。例如：犯过錯誤，可以使人覺得自己反正是犯了錯誤的，从此萎靡不振；未犯錯誤，也可以使人覺得自己是未犯过錯誤的，从此驕傲起来。工作无成績，可以使人悲观喪气；工作有成績，又可以使人趾高气揚。斗争历史短的，可以因其短而不負責任；斗争历史长的，可以因其长而自以为是。工农分子，可以自己的光荣出身傲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又可以自己有某些知識傲視工农分子。各种业务专长，都可以成为高傲自大輕視旁人的資本。甚至年齡也可以成为驕傲的工具：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老年人又可以因为自己富有經驗而看不起青年人。对于諸如此类的东西，如果没有自覺性，那它們就会成为負担或包袱。有些同志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屢犯錯誤，背上了这类包袱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檢查自己背上的包袱，把它放下来，使自己的精神获得解放，实在是联系群众和少犯錯誤的必要前提之一。”

毛主席又常教导青年要虛心學習，向老年人學習。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中，为“中山县新平乡第九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青年突击队”一文加按語說：

“当然青年人必須向老年人和成年人學習，要尽量爭取在老年人和成年人同意之下去做各种有益的活动。”

毛主席对青年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有重要的指示。对于青年学生，毛主席特别强调要有实际知识，要作个名副其实的完全的知识分子，不仅要有书本知识，还要到实际中去，接触实际，掌握实际工作经验。一九四二年二月，毛主席在“整顿党的作风”里说：

“我们现在看看一些学生，看看那些同社会实际活动完全脱离关系的学校里面出身的学生，他们的状况是怎样呢？一个人从那样的小学一直读到那样的大学，毕业了，算有知识了。但是他有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还没有参加任何实际活动，还没有把自己学得的知识应用到生活的任何部门里去。象这样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个完全的知识分子呢？我以为很难，因为他的知识还不完全。什么是比较完全的知识呢？一切比较完全的知识都是由两个阶段构成的：第一阶段是感性知识，第二阶段是理性知识，理性知识是感性知识的高级发展阶段。学生们的书本知识是什么知识呢？假定他们的知识都是真理，也是他们的前人总结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经验写成的理论，不是他们自己亲身得来的知识。他们接受这种知识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必须知道，就一定的情况说来，这种知识对于他们还是片而性的，这种知识是人家证明了，而在他们则还没有证明的。最重要的，是善于将这些知识应用到生活和实际中去。所以我劝那些只有书本知识但还没有接触实际的人，或者实际经验尚少的人，应该明白自己的缺点，将自己的态度放谦虚一些。

有什么办法使这种仅有书本知识的人变为名副其实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办法就是使他們参加到实际工作中去，变为实际工作者，使从事理论工作的人去研究重要的实际问题。这样就可以达到目的。”

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在“改造我们的学习”里又指出，在学校教育中，也要引导学生联系中国的革命实际：

“在学校的教育中，在在职干部的教育中，教哲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逻辑，教经济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经济的特点，教政治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中国革命的策略，教军事学的不引导学生研究适合中国特点的战略和战术，诸如此类。其结果，谬种流传，误人不浅。在延安学了，到县里就不能应用。经济学教授不能解释边币和法币，当然学生也不能解释。这样一来，就在许多学生中造成了一种反常的心理，对中国问题反而无兴趣，对党的指示反而不重视，他们一心向往的，就是从先生那里学来的据说是万古不变的教条。”

一九四〇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不应颂古非今，要引导青年向前看：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的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毛主席对青年的关怀是无微不至的。他对青年身心的成长、文化的提高，都不断地给予勉励。一九五三年七月，毛主席在接见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说：

“我给青年讲几句话：

- 一、庆祝他们身体好，
- 二、庆祝他们学习好，
- 三、庆祝他们工作好。”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毛主席在苏联向莫斯科的中国留学生、实习生讲话时勉励同学们三件事：

“第一，青年人既要勇敢又要谦虚；第二，祝你们身体好、学习好、将来工作好；第三，和苏联朋友要亲密团结。”

回忆“五四”前后我的思想转变

吳玉章

一、流亡法国，接触社会主义思潮

从1911年辛亥革命起，到1919年五四运动止，这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战斗岁月。当时，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所篡夺，革命党的组织陷于土崩瓦解，中国天空上布满了黑暗的阴云。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掠夺和掠夺；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1913年七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南京、上海、江西、安徽、广东、四川等地的国民党军队发动了反袁起义。我们深信从未未能坚持建立革命政权，而把政权轻易地让给袁世凯，现在不得不在力量悬殊的情形下起来作斗争。我们还想凭着勇气和热情来挽救流亡了的辛亥革命。但是起义各军准备不足，心志不齐，又未及时号召民众起来反对袁世凯违法乱纪，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军事行动上，结果在袁世凯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起义好像曇花一现而失败。仅存存南方几省内的一点革命军事力量也被挫折殆尽。

起义失败后，我还留在上海。我并不认为革命从此就完了，我相信袁世凯的统治是不会长久的，所以想隐蔽在上海，继续为革命做一点工作。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放过我，指名说我是四川重庆熊克武反袁起义的策动人，对我下了通缉令。我在上海站不住脚。于1913年十一月亡命法国。

我在法国巴黎居住了两年多，思想上非常苦闷。“中华民国”成立了只有一年多，中国的政治局面就弄得那样糟糕，革命爱国之士或死或逃，我也被军阀撵到了外国，革命失败得真是再惨痛不过了。我时时刻刻惦念着中国的情形，希望革命火会再一次迅速地燃燃起来，把丑恶的军阀统治整个干干净净。1914年春季我没有入学，痴心指望能很快地能再有一个回国参加斗争的时机。但是过了半年，国内没有一点革命波动的迹象，而且袁世凯还修改了民元约法，解散了国民党以及国会，担任了终身大总统，许多北洋派爪牙也纷纷爬上了各省都督的位置，看起来

袁世凯气焰嚣张，不可一世，我的回国希望暂时也不能实现，于是决心先埋头读书。辛亥革命以前，1903年我初到日本时，决心要学一门科学，选的是电气工程，由日本成城中学毕业，考入第六高等学校，边学习边作革命工作，1911年毕业，未入大学即回国参加辛亥革命。我原来学的是工程技术，但由于国事日非，只得经常从事革命活动，深深感到“所学非所用”，于是进了巴黎法科大学，改学政治经济学。

亡命巴黎的两年多，看到了不少事情，接触了不少人物，长了不少见识。这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交战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彼此疯狂地屠杀，整个欧洲沉浸在血泊中，好像一个大屠宰场。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已暴露无遗。同时，社会主义思潮风起云涌，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思想流派，盛行一时。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做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这个远景虽然是美丽的，但是如何能够实现它？我们当前应该做些什么？我仍旧是茫然的。我曾经和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谈起这些问题，李石曾认为：“我们只要搞教育，宣传互助、合作，传播这种美丽的理想，努力去感化别人就好了。至于总统、皇帝及其他官职和议员，让人家去当没有关系。”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我说：“教育、宣传工作固然要做，但是组织工作也要做，没有强有力的组织，团结和培养人才，是干不了革命的，你不去侵犯皇帝、总统，人家就要侵犯你。”李石曾的思想是典型的克鲁巴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我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感到这种不要组织革命团体的主张根本是行不通的。仅仅有一个美丽的理想，而没有一套实现理想的革命方案和革命策略，那又有什么用呢？因此，我在法国虽然接触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流派，但是它们并没有给我指明一条拯救中国的大明大道。

二、軍閥腐朽統治的一個實例

1914年以後，中國的政局發生了變化。日本帝國主義趁着歐洲大戰的機會出兵山東，并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滅亡中國的第二十一條件。袁世凱為了換取日本對他稱帝的支持而接受了這些條件，秘密地簽了字。1915年底袁世凱假弄公民投票，強奸民意，而公然稱帝，結果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在他逐步地往上爬的時候，反對他的各種社會力量也在逐步地集合起來。1915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雲南護國軍首先起義，各地紛紛響應，袁世凱的皇冠不久就滾落在塵埃里。1916年六月六日，這個窮國大盜在全國人民的反對聲中活活地氣死了。

袁世凱統治垮台，對我的通緝令自然失效。隨後，南北和議達成，蔡元培被任命為北京大學校長，我就和蔡元培一起從法國回國，1917年二月我到達北京。我到北京有一個任務，因為歐洲大戰開始以後，法國人力不足，需要大招工，袁世凱政府和法國訂立了一個關於招募華工的條約，內容對中國工人非常不利，經手人梁士詒從中撈了很多錢，根本不顧工人的利益。這時候我們已在法國組織了華法教育會，主持人有蔡元培和我，目的是要在到法國去的大批華工中進行教育，並希望國內貧苦學生能出來留學，還組織了勤工儉學會。由於袁世凱政府與法國所訂的條約對工人很不利，我們出來力爭，費了很大周折，與法國改訂條約。規定中國工人和法國工人同工同酬，總算為工人們爭回了一些權利。我就攜帶這個條約草案回國，要求北京政府批准。

回到北京一看，中國的政治局勢還像從前一樣。袁世凱雖然死了，但是北洋軍閥繼承着袁氏的衣鉢，並分化成大大小小的派系，展開了爭權奪利的鬥爭。政府中貪污腐敗風氣，依然如故。華工新約送到外交部，足足等了四個月還沒有批准的信息。

有一天，一個素不相識的人來訪問我，他問我：“聽說你帶回一個招募華工赴法的條約，批准了沒有？”我說：“還沒有批准。”接着我詳細地給他解釋了這個條約比前一個條約要好的多。他說：“你沒有在北京住過嗎？你是學生嗎？真是迂夫子！這裏的事，非錢不行。如果有錢，再壞的條約也能批准。如果沒有錢，再好的條約也批不准。你這種事至少可以賺幾百萬，你就是拿一二百萬出來也不算什麼？”我說：“我們就是為了反對賺工人的血汗錢，才辛辛苦苦爭回了一些權利。我們沒有錢，不但不願拿錢去運動，就是人家拿錢來運動我也不行！”說着說着兩個人就大吵起來。他临走時說“你扶得，讓你看吧！”事後才知道，這個人就是北京政府外交部的一位科長派來的。在軍閥官僚統治下，什麼好事也办不成，不剷除軍閥統治和官僚制度，中國決無得救的希望，這是我對的

一次嚴重教訓，我立志要和惡勢力鬥一鬥。當時我沒有任何其他辦法，還幻想通過個人關係去說服外交部長伍廷芳。我想：伍廷芳是一個同盟會員，總不會和貪污官僚一樣。他身為外交部長，是會有批准條約的權力的。那裏知道：官僚機構，重重疊疊，相互牽制，伍廷芳雖然答應批准條約，可是外交部內上上下的官僚們都想撈一點油水，仍舊拖延不動，事情就這樣拖下去，沒有得到結果。

我這時一面在交涉條約的事情，一面又進行第二個任務，就是辦留法勤工儉學，設立了一個留法預備學校，同時又給四川同事去信請他們也成立留法勤工儉學分會。1918年留法勤工儉學的消息傳到了湖南以後，四川、湖南等地掀起了留法勤工儉學的高潮。但是這時我目睹國內的混亂和腐敗，眼前一片黑暗，不知出路何在？

不久又證明，在軍閥統治下，連教育工作也不會讓你安定地做下去。這時北洋軍閥正在進行爭權奪利的鬥爭，總統黎元洪和國會議員站在一邊，背後有美帝國主義的支持；國務總理段祺瑞和大多數省份的督軍站在另一邊，背後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他們之間圍繞着對德宣戰問題，展開了勾心鬥角。段祺瑞唆使督軍團包圍國會，胁迫黎元洪一定要通過對德參戰案，以便借此機會，大借外債，擴充實力；黎元洪為了對抗段祺瑞，勾引頑固派張勳進京。其實張勳和段祺瑞暗中也有勾搭。1917年六月張勳進了北京，就搞了一出“宣統復辟”的丑劇。當時，北京城內，兵荒馬亂，到處搶掠捉人，凡是與辛亥革命稍有點關係的人都紛紛避難出京，我也只得暫時放下教育工作，避往天津。隨後段祺瑞又玩弄手段，以“恢復共和”為名，赶走張勳，獨攬政權。這時辛亥革命所遺留下來的“民元約法”被軍閥完全撕毀了。南方為了護法，在孫中山先生領導下，成立了軍政府，於是出現了南北兩個政府對立的局面。

三 “南與北一丘之貉”

1917年七月，伍廷芳和海軍部長程潛光率領海軍南下，孫中山先生也到了廣州，主張“護法”，在廣州組織軍政府，非常國會選孫中山為大元帥，聯合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湖南等省，對抗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1917年年底熊克武驅逐了劉存厚，統一了四川，要我代表四川省參加軍政府，我於1918年二月到廣州見了中山先生，隨即又回北京把所負責法教育會的工作進行了交代，六月才去廣州任職。原來軍政府初成立，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桂系和派系軍閥的力量，我們當時以為滇桂軍閥與北洋軍閥有矛盾，可以利用他們來為革命服務，而且他們實力較小，不像北洋軍閥那樣跋扈難制，有可能團結他們，使

他們服從中山先生的領導。不久就證明，這種想法是十分錯誤的。軍政府成立後，野心勃勃的桂系軍閥陸榮廷、莫榮新暗中一直在和北洋軍閥勾結，並且跟我們大鬧幕後磨擦。軍政府成立不到一年，中山先生終於被排擠，1918年五月由廣州回到上海。他在辭職通電中痛斥桂系軍閥說：“南與北一丘之貉。”中山先生這時真是傷心慟憤到極點了。

當1918年六月我再到廣州的時候，孫中山先生已經到上海去了。七月間軍政府改為七總裁制，中山先生也被列為七總裁之一，我當時曾到上海勸中山先生就職，他未同意，我又勸他可派代表去應付，他答應了。我們當時仍想團結各方面的力量來抵制桂系，以圖救大難於萬一。我們所能團結的力量有南下的國會議員和軍閥，有各省軍的代表，有中山先生的嫡系派員——陳炯明所統率的粵軍，還有廣東的一些地方派人軍。桂系特別把陳炯明部視作眼中釘，千方百計想消滅它，陳炯明部被迫退駐在福建的漳州，不能回粵，情形很危險。這時軍政府內部展開了激烈的鬥爭，我們揭露桂系和北洋軍閥勾結的事實，反對桂系排擠粵軍，極力保全陳炯明部。在會議上，我常常和站在桂系方面的政學系政客爭吵起來。桂系軍閥恨我入骨，要求四川省撤換我的代表職務，到了1919年他們策劃成南北和議時，我就不再當代表了。

參加护法，使我十分深刻地体会到中山先生所说“南与北一丘之貉”的名言。而且就是我们当时苦心孤诣所要保全的陈炯明又何尝不是与南北军閥同属“一丘之貉”呢？不久以后，陈炯明利用国民党和中山先生的威信，驅逐桂系，重返廣州，並且隨後又背叛了中山先生。这个叛徒要知道当时中山先生如何苦心扶植他，我們又如何竭力保护他，他真應該慚愧而死。在當時軍隊是私人的財產和工具，軍隊的活動完全听命于他們的統帥，不知道有國家民族，我們也沒有可能去根本改造舊軍隊，使它成為革命的武器，而只是看到個人的作用，力圖爭取有實力的統帥。從辛亥革命起，我們為了推翻滿朝而遷就袁世凱，後來為了反對北洋軍閥而利用西南軍閥，再後來為了抵制西南軍閥而培植陳炯明，最後陳炯明又叛變了。這樣看來，從前的一套革命老辦法非改變不可，我們要從頭做起。但是我們應該依靠什麼力量呢？究竟怎樣才能挽救國家的危亡？這是藏在我們心中的迫切問題，這些問題時刻攪擾着我，使我十分煩悶和苦惱。

四、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給我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十月革命剛發生的時候，1918年我在廣州，由於帝國主義和北洋政府封鎖消息，我們還不知道俄國已發生了一個開辟人類歷史新紀元的偉大革命。但是消息是不可能長期被封鎖住的，後來我就讀到了約翰·里

德寫的“震動寰球的十日”，這本書對十月革命的過程描寫得很生動。通過這本書，我了解到我們北方鄰國已經建立了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建立了一個工農政府，偉大的俄國人民已經擺脫了剝削制度，獲得了真正的自由解放。從前我在法國接觸了社會主義各種思想流派，深深為社會主義理想所吸引。今天這個理想居然在一個大國內開始實現了，心中感到無限興奮和鼓舞。1919年，我資助幾個學生到蘇聯去學習，希望他們能為中國帶來新的革命理想和革命方法。但是後來聯繫中斷了。直到1920年，我一度去北京，碰到了王維舟同志，他本來在四川軍隊中工作，由於四川軍內部要打仗，他不願意參與，便交出了所率領的軍隊，到蘇聯去工作和學習了一年，1920年八月間，他回到北京，對我比較詳細地介紹了蘇聯的狀況，使我对這個新起的偉大社會主義國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和更深厚的感情。當時蘇聯正處在國內革命戰爭的困難時期，物質非常缺乏。王維舟同志和我就在北京東安市場召集許多青年學生，開了一個“俄災救援會”，向各方募捐，一下子就捐募到幾萬元錢，買了許多面粉和日用品寄往莫斯科。後來王維舟同志又到上海募了幾萬元。那時候中國人民對十月革命非常同情，人人都希望能出一分力量來支持蘇聯，所以我們的募捐能夠有這樣大的成績。

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下，1919年發生了划時代的“五四運動”。五四運動前夕，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巴黎和會召開的時候，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參加和會。大家希望可以通過巴黎和會，收回日本在山東所占奪的權利。美國總統威爾遜也發表了花言巧語的“十四條”，其中也有主張民族自決的詞句，偽裝同情殖民地人民的悲慘遭遇。當時中國人民對巴黎和會大多抱著幻想。可是和會上帝國主義的弱肉強食，毫無公理和陰謀欺詐等等，再一次地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民。日本帝國主義蠻橫地堅持要繼承德國在山東的一切權利和我美國賊訂定的一切條件，偽善的美帝國主義不僅幫着日本說話，反怪中國何以在山東問題上有“欣然同意”的簽字，以逃避他的責任。結果，和會決議：德國在山東權利一讓與日本。中國以“戰勝國”的資格却得到“戰敗國”的待遇。

山東問題交涉失敗的消息傳來，全國憤激。1919年五月四日，北京首先發生了愛國示威運動，懲罰了美國賊，各地紛紛響應。雄偉的工人和學生的隊伍走上了街頭，全國範圍內激揚起反帝反封建的偉大浪潮，這是真正激動人心的一頁，這是真正偉大的歷史轉折點。從前我們搞革命雖然也看到過一些群眾運動的場面，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這種席卷全國的雄壯浩大的聲勢。在群眾運動的沖激震蕩下，整個中國從沉睡中復甦了，開始散發出青春的活力，一切反動腐朽的惡勢力，都顯得那樣猥瑣渺小，搖搖欲墜。以往搞革命的

人，眼睛总是看着上层的军官、政客、議員，以为这些人掌握着权力，千方百计运动这些人来贊助革命。如今在五四群众运动的对比下，上层的社会力量显得何等的微不足道。在人民群众中所蕴藏的力量一旦得到解放，那才真正是惊天动地、无坚不摧的。特别是一向被人輕視的工人群众也发出了怒吼，像上海那样的大都市，六月五日开始一声罢工、罢市令下，整个城市的繁华绮丽顿时变成一片死寂，逼得北洋军阀政府不得不于九日免去美国賊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輿的官职。工人阶级的奋起，这是一支真正能制一切反动派于死命的伟大生力军。这时中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革命的性质完全不同了。

处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伟大时代，我的思想上不能不发生一种非常激烈的变化。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五、新道路的起脚点

1919年，我被西南军阀排挤，退出军政府，十月底回到四川。就在这一年，我读到了一本日文叫“过激派”（日本对布尔什维克的恶意的称呼）的书。

人读一本新书，通常是根据自己的过去的思想意识和生活经验来吸收新书中的内容，作出判断和选择。所以同样一本书对于不同环境中不同的人，往往会发生不同的影响。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径。我渴望了解苏联革命的经验，“过激派”这本书，恰恰满足了需要。我反复地阅读它，结合着自己过去的经历，深深地思索，把以往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作了一次详细的批判和总结。我体会最深刻的有以下四点：

第一、工人和农民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他们用辛勤的劳动哺育了整个社会。但是他们自己却“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世世代代过着贫困的生活。而地主、资本家，游手好闲、不事劳动者，却过着奢侈的生活。如何能使这些人绝迹？布尔什维克主张“不做工，不得食”。我非常拥护这个主张。的确，对于这些社会上的寄生虫，一定要强迫他们去劳动，让他们“自食其力”，社会才能够安定和繁荣。

第二、布尔什维克认为：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才能够得到解放。这个道理在从前我是不能理解得深刻的。从前虽然对下层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寄予极大的同情，搞革命

就是为了解救民众的苦难，但是总以为革命只能依靠少数知识分子职业革命家，没有看到广大人民中所蕴藏的伟大的革命潜力。经过十月革命，世界上出现了第一个工人阶级的政权，经过五四运动，中国工人阶级发挥了冲击旧制度的伟大力量。在国际和国内的新形势下，读了这本书，深深感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辛亥革命只在知识分子和军人中进行活动，恰恰是没有把下层民众动员、组织起来。所以革命显得软弱无力，反动派一旦反攻，就陷于土崩瓦解。今后一定要改变办法，革命新办法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依靠工人阶级，依靠下层民众。

第三、我从前读无政府主义的著作，觉得他们不要组织的做法是不可能成功的。1915年听到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党员要有绝对服从的义务，不能自由行动，组织手续很严格，入党时还要按手指印。我觉得他的办法比无政府主义强的多，但是党员入党时要打手指印的做法又太落后，有点旧式会党的气味。究竟怎样才好呢？我始终抱着疑问。布尔什维克主张由工人阶级中的先进分子组成一个坚强的、有纪律的、有战斗力的共产党，作为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革命队伍。这个主张使我多年以来所未能解决的疑团，涣然冰释。

第四、辛亥革命时，我们对掌握政权和改造国家机器太不注意了，当时为了迁就袁世凯而让出了政权。有些人（如宋教仁）还幻想用议会斗争的方式来控制住旧的国家机器，结果反动派就能够利用现成的政权和旧国家机器向我们进攻。布尔什维克认为：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必须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新的国家机器，才能够巩固革命的胜利。这正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像中国这样一个几千年相承下来的以官僚制度为核心的旧国家机器，是许多罪恶的根源，其势力根深蒂固，即使经历许多次的革命风暴，但在官僚国家的荫庇下，万恶势力仍会死灰复燃。以往我也常想这个问题，模模糊糊地想不出一个道理。布尔什维克关于政权和国家的理论，解决了我的问题。

我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在这类问题上有了点新的体会。这些体会当然是很肤浅的，但却形成了我的新道路的起脚点。说起来真是可怪，我那时渴望能够看到一本马克思或者列宁的著作，但是我东奔西跑，忙于应付事变，完整的马列主义的著作又不易得到。所以只好从一些报刊杂志上零星地看一点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我当时只是认为：重要的是要把这些知识贯彻到行动中去，身体力行，为革命做一点贡献。

六、利用“自治”講台做宣傳工作

1920年南方各省掀起的“自治运动”的潮流，給我提供了初步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機會。“自治运动”是怎麼回事呢？原來當時的政治局勢是十分混亂的，在全國範圍內，是北洋政府和廣州政府南北對峙的局面；在北洋政府內部有皖系、直系、奉系的對立；在廣州政府內部有革命派和派系、桂系軍閥的對立；甚至一省之內也有許多小軍閥割據稱雄。當時北洋派大軍閥以“武力統一”為名，攻打南方各省，發生連年混戰的局面，社會秩序，十分混亂，人民生活，極為痛苦，特別是湖南省受戰禍最慘。段祺瑞的爪牙張敬堯作了督軍，橫行霸道，連小學都封了。因此，湖南群眾起來組織了驅張運動，逐走了這個孟賊，出現了要求“自治”的潮流。所謂“自治”，就是由本省人制定省憲，選舉省長，管理本省事務。這種主張當然不是挽救中國危亡的根本辦法，因為當時人民群眾沒有發動起來，本省人治理本省，其結果仍不外是本省的上層分子壓迫本省的下層人民，但在北洋軍閥“武力統一”的叫囂聲中，它卻不失為是抵制北洋軍閥的一個有效武器。由於當時人民群眾對北洋軍閥最為痛恨，因此這個反對北洋大軍閥的“自治”口號，受到人民群眾一定程度的支持。當時各省參加運動的人很複雜，有馬克思主義者，有急進的民主主義者，有資產階級，但也有為保全並擴充自己地盤的地方軍閥和政客。

我回到四川以後不久，“自治”潮流就卷進了四川。當時四川情形也十分混亂，1920年二月，屬於國民黨的四川省長楊庶堪及謝持等為了爭奪權力，聯合了滇軍、黔軍，攻打同屬於國民黨的督軍熊克武，熊敗退至保寧。下半年熊克武又聯合旧川軍劉湘、楊森等部進行反攻，驅逐楊庶堪等。勝利後熊發表了解除四川督軍職務的通告，經協商後分為三軍，以但懋辛、劉湘、劉成勳為一、二、三軍軍長，協同維持川局，使局面暫時安定下來。劉湘及其所屬的楊森各抱野心，隨時企圖奪得全省政權，主要是反對熊克武，四川全省弄得各軍閥從心造，四分五裂，動蕩不安。北洋軍閥的軍隊這時駐紮在陝南、鄂西，注視着四川的形勢，隨時準備大舉入川。在這種具體形勢下，“自治”就變成了人民要求自己作主來統一全省以反對北軍入川的政治運動。

我對於四川“自治”的態度是：不同意把“自治”當作解決問題的根本辦法，但是在當時具體形勢下，應該抱贊助態度，並積極參加這個運動。因為：

第一、“自治”可以抵制北洋軍閥，也有利於制止本省的混戰，創造一個比較安定的環境。第二、“自治运动”提供了向人民進行宣傳教育的機會，不應該拒絕這個機會，應該利用它把群眾的覺悟引向更高的水平。第三、假使革命派不參加這個運動，那末，地方軍閥就會去控制這個運動，使運動成為他們達到私利的工具。因此在運動中對於地方軍閥一定要進行揭露和鬥爭。

1920年底，我們開始了組織活動，1921年四月一日成立了“全川自治聯合會”，一百多個縣每縣都有一、二個代表來參加，我們通過這個組織系統，了解四川各縣的許多情況。我也借著這樣一個公開的講台，開始宣傳馬克思主義，經常寫文章，做講演。“全川自治聯合會”的宣言和十二條綱領就是由我起草的。其中以“建設平民政治、改造社會經濟”為總目標，強調民主政治以反對軍閥專制；提出“不工作、不得食”以反對社會寄生蟲；提出“民眾武裝”以反對軍閥武裝；提出“合作互助”以改善工農生活。十二條綱領是：“全民政治”、“男女平權”、“編練民軍”、“保障人權”、“普及教育”、“公平負擔”、“發展實業”、“組織協社（即合作社）”、“強迫勞動”、“制定勞工法律”、“設立勞動機關”、“組織職業團體”等，每一條綱領都詳加解釋，許多觀點開始擺脫了舊的束縛，初步反映了馬克思、列寧的一些主張。這個宣言和綱領曾經登載在當時創刊的“新蜀報”上，各縣進步青年看了，十分歡迎。我从前許多老朋友看了，也感到我的見解變得更新奇了。

我通過這個自治機構，初步傳播了一些進步思想。大會開幕時，全省人心振奋，可容千餘人的重慶商會大禮堂，座無虛席，門窗外還有許多人佇立而聽，許多人都說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的盛會。可是會開不過十多天，劉湘、楊森就企圖收買自治聯合會，以作為他們的御用民意機關，自治聯合會中的成員本來就很複雜，有些卑鄙的人已經被他們收買。我覺察到這種情況後，就把大家發言擁護自治、起草省憲的意見形成決議通過，並宣布“我們聯合會的宗旨是促成省憲，不能代替民選的省議會，我們大家已決議實行自治，起草省憲，任務已經完成，至於起草省憲的權力應該交給省議會”。這個意見得到多數人的贊同，於是就把起草省憲之權移交給省議會，而把自治聯合會解散了。我當時所以這樣做，是因為省議會還在國民黨多數的控制下，還不被反動軍閥任意操縱。軍閥劉湘、楊森費了很多心機，用了許多錢收買代表，結果仍舊是人財兩空。他們因此恨我入骨，下令通緝我。

四川“自治运动”本身，並無成效可言，但這個運動却使我有了一個面對廣大人民講話的機會，使我把新近体会到的一些想法得以傾吐於廣大人民之前，而且得到了熱烈的反響，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重大的收獲。而且通過“自治”的失敗，使我又有兩個教訓：第一是進一步体会到在軍閥統治下毫無民主可言，要拯救中國，必須首先用武裝的革命來推翻封建軍閥統治。第二是自治聯合會那種地域性的臨時的組織極容易為敵人破壞，必須要有一個堅強的革命的戰鬥的組織來領導革命。這時候我內心非常強烈地要求組織像布爾什維克那樣的政黨。其實恰好在這個時候，我們偉大的中國共產黨正在上海秘密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不過我遠在被封鎖的四川，並不知道。

全川自治聯合會解散後，我就到成都把制省憲任

務交給省議會議，然後到南充、綏定等地講演，1922年初我又到了成都。

七、整頓成都高師，組織工人農民

1922年夏，成都高等師範學校鬧風潮，校長去職，學生和當局請我擔任高師校長，我又不辭地擔任了這個職務。我在校內進一步展開了宣傳和組織活動。

我費了很大力量來辦這個學校，從前學校中紀律非常鬆弛，課程內容也陳腐不堪。我到校以後，採取革新的措施，聘請了許多具有新思想的人來擔任教師，並加強學校紀律，扭轉了散漫的風氣和革除了落后的封建陋習，對教師和學生的學習、生活盡力關心照顧。經過一番整頓，學校面貌大大改觀，師生員工團結得很緊密，樹立了一種嶄新的學風。同學們有秩序，有朝氣，追求知識，孜孜不倦，議論政治，意氣激發，成都高師成了進步勢力的大本營。

五四以來，四川省的新文化運動很快地就開展起來。除了成都高師學生創办的“星期日”等刊物進行鼓吹新文化、新思潮以外，許多外地的新書報也紛紛傳入，先進的馬克思主義者傅代英等都曾到四川進行宣傳活動，我對馬克思主義的理解也隨着形勢的推移而逐步深入。

我利用同盟會老會員的身份，尽可能地推進新思潮的擴展，除了在校內工作外，並利用個人與四川上層社會的歷史關係，為革命同志作掩護。如1922年，傅代英同志在涪州被川軍顧心淵部所扣押，我知道後就發電報去涪州，保釋代英同志，並請他到成都高師任教將近一年，傅代英同志是最受學生歡迎的教師，他在成都高師期間，把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活動推向一個更高的階段。

在這時，我們還派人深入到工人和農民中去做宣傳和組織工作。成都市有一個兵工廠，工人很集中，此外市內還有許多分散的絲織工人，我們派學生去分片聯繫，組織工會，發動罷工。另外在成都近郊和某些鄉村的農民中，也有學生去進行活動，組織農會。當時成都經常發生罷工事件，我的一個老朋友跟我開玩笑地說：“只要把吳玉章捉來殺了，罷工就不會發生了。”的確，當時四川的一些軍閥對我恨透骨，但是因為我和同盟會、國民黨的歷史關係，更因為當時群眾偉大力量的支持，反動派也奈何我不得。

當宣傳和組織工作開展到工人、農民中去以後，成立無產階級政黨的的要求也就愈來愈迫切。這時成都高師內已有社會主義青年團的組織，我當時年已四十四歲，當然不能參加，於是與楊闇公同志等二十多人秘密組織了“中國青年共產黨”，作為領導革命鬥爭的機構，並發行“赤心評論”，作為機關報。由於四川地處僻遠，一直到這時候，我們還不知道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也不知道國共合作的新時期即將開始了。

八、參加中國共產黨

1923年，劉湘、楊森勾結吳佩孚進攻四川，1924年一月楊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成都高師，我就交卸

高師。當時“五一”勞動節快要來到了，我們一些人懷着興奮的心情籌備一次盛大的紀念會，許多青年人通過工會組織在工人中做了許多宣傳鼓動工作，紀念大會一切都已準備就緒。突然，四月二十九日，有人告訴駐在成都的軍閥楊森，說“五一”紀念會是吳玉章的“陰謀”，要組織工人、農民和學生推翻楊森，奪取政權。第二天，成都市內實行戒嚴，空氣非常緊張，楊森的軍隊紛紛從各地調回成都，我們預定的會址“少城公園”也被軍隊看守起來了，並且揚言要捉拿吳玉章。

在這緊張的時刻，成都工人階級表現了不畏強暴、不屈不撓的英勇鬥爭精神，他們不顧反動軍隊的武裝威脅，仍在公園內召開了紀念大會。我當日本欲參加大會，由於同志們力阻，未能親身參加；近郊農區也被反動軍隊阻止，未能入會師。

“五一”事件以後，我在成都立不住腳了，隨即離開成都和劉伯承同志一起離開四川，取道貴州、湖南、到上海。到上海一看，全國工人運動的浪濤洶湧澎湃，國共合作已經開始，廣州革命政府日益鞏固，革命局面蒸蒸日上，真是感到無比的興奮鼓舞。當時孫中山先生為召開國民會議的事已赴北京。我也於1925年二月趕到北京去。本擬見中山先生，他因病重不能接見，不久他就逝世了。

我到北京後，見到中國共產黨北京市委負責人之一趙世炎同志，才了解到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經過和活動情況，我就在這時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時寫信去四川，要楊闇公同志等把“中國青年共產黨”取消，個別地參加中國共產黨。

我入黨的那年已經四十六歲，我的前半生一直在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上摸索前進。從我少年時代听到中日甲午戰爭失敗起，就為國家的憂患而痛苦、而焦慮、而奔走；我們在豺狼遍地的荒野中想尋找一條出路。許多我所敬仰的、熟悉的同志為此而獻出了生命，但是直到“五四”運動以前，還沒有找到一條光明出路。感謝十月革命，它的萬丈光芒照亮了殖民地人民的前途，我們找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這個理論武器一經與中國工人運動結合，立即發揮出無堅不摧的偉大力量。在這個新的歷史條件下，我才能够通過自己的具體歷程完成個人思想上的革命轉變，參加了共產黨，從一個民主革命者變成了一個共產主義者。

“五四”運動已經過去了四十年，這四十年國際國內的歷史，生動地證明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和生氣勃勃。現在國際形勢方面，東風已經壓倒了西風，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國家正在大踏步地奔向共產主義的前程；在國內方面，社會主義建設正在一日千里地躍進，偉大的祖國日益強大，日益繁榮了。讓我們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戰鬥旗幟吧！它已經引導我們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它正在引導我們建設社會主義，並將引導我們走向建設共產主義的更加偉大的勝利！



五月的历史性号召

邓拓

偉大的五月，對於我們是多麼富有革命意義的月份啊！特別是五月的最初幾天，遇到三個重大節日，給了我們以強烈的鼓舞和深刻的教育。

今年的五一國際勞動節，恰值這個日子被確定為國際工人階級神聖節日的七十周年；今年的五四運動紀念日是它的光輝勝利的四十周年；今年的五卅學習節是馬克思誕辰的一百四十一周年。這三個節日向我們發出了共同的历史性的革命號召：勞動、鬥爭、學習。

我們廣大年青的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自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的十年間，在生產勞動、革命鍛煉和學習這三個方面都已經做出了驚人的巨大成績，促進了我們社會主義事業的飛躍發展，這是有目共見的。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內和在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头一年，即一九五八年表現了空前規模的飛躍發展。現在我們正為爭取一九五九年的繼續大躍進而奮鬥。在這個時候，我們來迎接五月的三大節日，應該怎樣加強生產勞動、加強鬥爭鍛煉和加強學習呢？應該怎麼樣去爭取這三個方面同時都得到丰收呢？

無論工業、農業、運輸業、商業等各個戰線上，目前有許多地方正在展開一個以技術革命為中心的群眾性的社會主義紅旗競賽運動。這個群眾運動的中心環節，是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生產，厲行節約，反對浪費。廣大的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技術人員，在這個群眾運動中完全可以大顯身手，挖掘潛力，努力完成和超額完成計劃的指標。大家都為實現和超過原定的指標而展開了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這個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高峰在哪裡？尖端在哪裡？這是誰也不能估計的。高峰之上還會有高峰，尖端之上還會有尖端。你有多大本領就使出來吧！只要不是好高騖遠，而是實事求是，那末，你就一定可以做出新的成績。如果你看到工具不好，就努力改良工具；看到設備不善，就努力改善設備；看到機器利用率不高，就努力去提高它；看到設計圖紙有缺點，就努力加以修改或者重新設計；看到操作方法等有那些已經落后了，就努力用新的去代替它；看到勞動

力有那些地方使用不合理，就努力加以調整；看到原材料有那些浪費現象，就要努力防止和糾正；看到有什麼代用品甚至“廢品”可以利用，就要充分加以利用。總而言之，大家都要千方百計地提高產量，提高質量，提高勞動生產率和降低成本。這是我們目前在生產勞動方面的巨大任務。

實行政治掛帥是完成這個任務的根本保證。過去一年的大躍進經驗充分地說明，只要堅決地實行政治掛帥，提高幹部和群眾的思想覺悟，放手發動群眾，緊緊地依靠群眾，認真地貫徹群眾路線，生產勞動就會出現全面的高漲形勢。現在我們已經有了更多的經驗，今年我們應該從思想上政治上更進一步動員廣大青年工人、青年農民、青年知識分子，高度發揮自己的積極性和創造精神，立即投入轟轟烈烈的增產節約的群眾運動中去。

生產勞動對於我們每一個人都是一種必要的鍛煉，正如參加其他革命鬥爭的鍛煉一樣。在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現階段，我們除了對於外國帝國主義侵略勢力和國內殘余的反革命分子必須繼續進行堅決的鬥爭以外，一般地是以參加日常的政治運動和思想鬥爭為主；而在參加這些政治上思想上的革命鬥爭的同時，直接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體力勞動就成為我們不可缺少的實際鍛煉了。廣大的青年工人和青年農民當然是生產勞動的能手，青年知識分子也應該努力把自已鍛煉成為工業或農業生產勞動的能手。去年許多青年知識分子在生產勞動中表現了苦幹、實幹、巧幹的精神，受到工農群眾的歡迎，他們和工農群眾打成了一片，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思想作風都有了很大的進步。今年我們應該繼續動員和組織更多的青年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共同勞動，求得互相幫助，共同提高。每個青年人都應該立大志，使自已真正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

什麼樣才能算是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呢？這就是說，要用無產階級的科學的革命的 world 觀來武裝自己的頭腦，掃除一切剝削階級思想的影響，決心為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而服務；同時要系統

地學習和掌握現代的文化和科學知識，既能從事體力勞動，又能從事腦力勞動以及高級的研究工作。

我們國家的教育方針是教育為工人階級的政治服務，教育和生產勞動相結合。這個方針在執行中已經收到巨大成效，特別是學校的廣大青年學生和教師都參加了生產勞動，建立了勞動基地，這個成效極為顯著。但是，我們的教育方針還必須進一步地貫徹下去，才能收到我們預期的最大成效。

要把自己培養成為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就必須抓緊學習。不但要抓緊政治理論的學習，還要抓緊文化科學知識的學習。對待學習不能採取“實用主義”的態度，不能光看眼前需要什么就學習什麼。這樣不系統的零碎的學習，暫時似乎有利益，從長遠說來却是不利的。我們要提倡學習基礎知識，把根底打好。有了基礎知識，然後再學專業知識，一定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當然，無論學什麼，必須學好基礎知識，在這個基礎上學好專業知識。學工程的就應該成為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所需要的工程師；學農科的就應該成為社會主義農業生產所需要的農藝師；學醫的就應該成為人民群眾所尊敬的好醫師；學師範的就應該成為普及國民教育和傳播社會主義文化的好教師。在工廠里擔任車間主任，或者當技工，為了管理和使用日益複雜和精密的機器，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知識也將很難勝任。今後科學技術上的發明創造將越來越多，不學習就將一事無成，這難道還不明顯嗎？

有人說：“理論知識既然都是從實踐中來的，那末，只要勞動好，不讀書又有什麼要緊呢！”這個論調完全錯了。理論和實踐的關係是：實踐產生理論，理論又指導實踐。真正科學的理論應該是從實踐中來又到實踐中去。根據這個道理，離開生產勞動而空談理論知識，固然是毫無用處；但是，毫無理論知識的人，也難於在生產勞動中做出很好的成績，這也是可以肯定的。再進一步說，理論知識固然是人們從實踐經驗中得來的；但是，任何個人要得到知識，總不能夠僅僅依靠自己的實際經驗。因為個人的經驗畢竟有限，而需要的知識卻很多。於是，除了自己的知識之外，必須大量吸取別人的經驗，包括古人的經驗在內。自己的經驗是直接的經驗，別人的經驗是間接的經驗。要大量地學習間接的經驗，基本的方法就是讀書。我們反對讀死書，但是，我們也不贊成不讀書。因為有許多書籍上記載着前人大量的珍貴經驗，是我們非常重要的知識。

學習別人的經驗當然還有其他方法，比如訪問、談話、請別人介紹經驗等等。但是，這些方法只能用在一個時期之內，不可能用以學習前人的經驗。前人的經驗絕大部分只有在文字記載中才能找到。在這個意義上說，為了一定的目的去讀古書也是必要的。我

們反對厚古薄今，但是，我們也不贊成非古主義。我們主張古為今用，從古人的著作中吸取精華，棄其糟粕。這正如我們一方面反對迷信和崇拜外國，另一方面又反對輕視和排斥外國，而主張學習外國的一切先進經驗一樣。我們需要一切有用的知識，在任何時候都不要以自己的一點點實際經驗為滿足，不可不虛心地向本國、外國、古人、今人以及其他方面尋求知識。

我們中國人有很好的學習傳統，歷代克勤克苦追求學問的人多得很多，他們的故事一直流傳下來了。比如墨子就是好學好問的人，他還說到別的古比他更好好學更好問。他贊揚周公說：“昔者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如果講究做學問的方法，那末，墨子介紹周公的這個方法倒也是一個較好的方法。他一方面讀書吸取前人的經驗，一方面請教天下所有有知識的人，同他們交換對各種問題的意見。這樣努力追求學問，多學多問，當然經驗越來越多，知識也越來越多，在治理國家大事中當然能夠多謀善斷。周公的做法也可以算是歷史上的一个成功的例子。古人尚且如此，難道我們今天反而不如古人嗎？

毛澤東同志早已說過：“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該給以總結，我們要繼承這份珍貴的遺產。”現在我們無妨檢查一下，究竟我們繼承遺產的工作做得怎祥了？對於前人的切有用的經驗和知識，對於一切文化和科學技術的遺產，我們是不是都已經充分地加以總結和發展了呢？應該說，我們在這方面還有巨大的工作要做。我們要遵照毛澤東同志的話，認真地做好繼承遺產的工作，首先必須用正確的方法去讀書。

有人說：“古今中外有不少大科學家是没有大學文憑的人，可見讀書不讀書關係并不大。”殊不知這樣成功的大科學家根本不需要什麼文憑，他們在舊社會中也不可能進高等學校，不可能有文憑，這是事實；但是，他們却都是勤苦學習，掌握了豐富的知識和經驗，有大學問因而有大發明的人。他們沒有文憑並不是不讀書，恰恰相反，正是由於他們最用功讀書和從事研究工作，所以他們才成為受人尊敬的大科學家。這些大學家的學習精神和學習方法，倒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吸取的。

我們提倡用正確的方法讀書。所謂正確的方法到底是什麼呢？這就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的方法。那些脫離實際的書呆子的讀書方法，永遠是我們所不取的。我們對於過去的学校教育所以感到不滿意，所以要加以改革，理由也就在這裡。但是，我們並不是一概否定過去的学校教育。正如列寧在“青年團底任務”中說過的：“舊時學校是崇尚書本的学校，它強迫學生去通曉一大堆無用的、累贅的、死板的知識，這種知識閉塞着青年的頭腦，并把他們變成一些依法泡制的官吏。但是，如果你們從此便想做結論，說

无須通曉人類所积累起来的知識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們便犯了極大的錯誤。如果以为无須領會共产主义学說本身所产生的全部知識，而只要通曉共产主义口号，只要通曉共产主义科学底結論就已經足够了，这种想法也是錯誤的。”我們要改变过去学校的教育方法，主要的是要用理論与实际相结合的方法去代替理論与实际相脫离的方法。然而我們的教學方法也往往要因时、因地、因人而不同，往往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变化。近来由于理論普及和文化教育普及的工作的开展，群众在學習的过程中，創造了理論与实际相结合的許多新的形式，其中也有不少值得我們加以重視和推广。

我們还应该注意，學習的方法畢竟又不同于其他工作方法。學習的过程是复杂的思維活动的过程，这和生产劳动的过程不一样。因此，在學習方法上不应该机械地搬用生产劳动中的一套方法。比如，在學習过程中，有的先进，有的落后，有的处于中間状态。我們應該鼓励落后的向先进的學習，努力赶上先进；應該鼓励先进的更加先进。我們也可以組織适当的評比等等。但是，學習方面的这些做法决不能与生产方面的突击、竞赛等方法混同起来；而必須按照學習的时候腦力活动的規律性，适应學習的特点来决

定采取什么样的方法。一般地說，學習的方法要以教師的傳授和个人的自修为主。只有教師努力教好了，学生努力學好了，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集体的討論和同学的互助。如果自己不努力，那末，光靠集体的討論和互助也是學不好的。學習的步驟基本上是要循序而进，不可能一蹴而成。我們要打破那些束縛思想發展的陈旧教學法，而对于許多好的教學法却必須加以肯定。我們要改变那些不必要的拖长學習時間的教學进度，而对于正当合理的教學进度仍然應該加以肯定。从总的方面說，我們在學習过程中，同样應該也能够貫徹实行“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綫。學習如果没有干劲或者不鼓足干劲，就一定學不好；如果不力爭上游，就一定会后落；如果不多快好省，就一定不能适应实际需要。一切年青有为的人决不会甘心如此，人人都將要努力使自己在學習的道路上不断地前进。

在这偉大的五月到来的时候，我們要下一个决心，以我們的革命先輩和導師做榜样，尽最大的努力，在生产劳动、斗争鍛炼和學習等三个方面，不断地做出新的成績，用这样实际的行动，回答五月的历史向我們發出的偉大号召。

聪明的姑娘 (阿富汗童話)

朱丹译

有一次，馬路上走来一个美丽的姑娘，一个青年形影不离地跟随着她。姑娘回过头来，問道：

“陌生人，你为什么尽跟随着我呀？”

“我爱你，你是美丽姑娘中最美的一个！”

姑娘嫣然一笑，說道：

“在我后面走着我的妹妹。她的眼睛黑黝黝的，如同夜晚的星空一般。她要比我美丽上十倍呢！”

青年听了非常高兴，馬上回头跑去。他跑呀，跑呀，看見馬路上踉蹌走来一个老态龙鍾的老太婆，他嫌惡地吐了口沫，就回身又去追那个年青的姑娘，他赶上了她，說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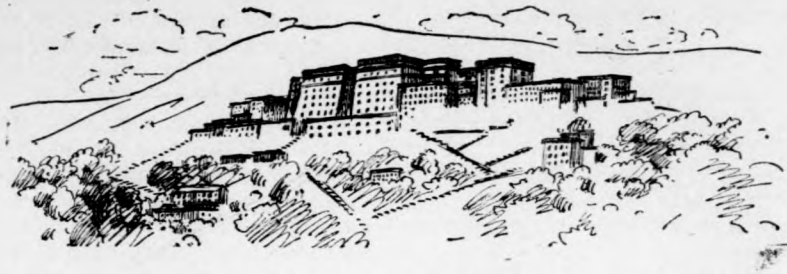
“你为什么欺騙我呀？”

“不，这是你欺騙了我呢，陌生人！如果你是真心爱我，那你就不会跑去追另一个女人了！”

青年羞得臉紅耳赤，只好走自己的路去了。

(譯自“阿富汗民間童話与詩集”)





西藏, 永远是我国的西藏

鍾 青

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分子，勾结帝国主义所发动的武装叛乱，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的讨伐下，已经遭到可耻的失败。西藏叛乱的平息，是我国人民生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西藏人民将从此摆脱极端落后和黑暗的生活，走向繁荣幸福的大道。但是在西藏叛乱发生以后，敌视中国的帝国主义者乘机兴风作浪，对我国进行恶毒的污蔑；在印度国内也发出了一片“关心”西藏、干涉中国内政的喧嚣。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利令智昏，正在扮演着一出卑鄙而又滑稽的丑剧。他们和叛乱分子勾结，狼狽为奸，制造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鼓吹什么“西藏独立”，目的不过是想继承帝国主义的衣钵，企图利用逃往印度的这一小撮叛乱分子来达到他们分裂中国的统一，干涉中国内政的野心。但是，他们这些行径，丝毫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西藏民族是中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这个铁的事实，不是这些扩张主义者的荒唐的梦想所能改变得了的。他们忙碌的结果，不过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到头来落得一塌空梦，并且使自己声名狼藉。

不可磨灭的历史铁证

西藏民族是我国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西藏地方是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从十三世纪以来几百年的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翻开我国的历史就可以看到，西藏民族和祖国各民族（主要是汉族）的交往，很早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唐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公元641年（唐贞观15年），唐太宗李世民的宗室女文成公主和藏王（那时称吐蕃王）松赞干布结婚，带去许多书籍和造纸、建筑、釀

酒等手工业工人，西藏也派人到唐朝的都城长安来留学，并从内地请去许多工匠。文成公主还协助藏王创立藏语拼音文字，普及教化，改革西藏事务。这对西藏的经济和文化都有推动作用。藏王松赞干布为了纪念汉藏民族通婚，曾“筑一城以夸后世”，西藏著名的城市拉萨，就是在那时修建的。公元710年，唐中宗的女儿金城公主又同藏王尺带珠丹结婚，汉民族的生产技术和文化进一步传入西藏。“毛诗”、“礼记”、“文选”、“左传”等书籍就是通过金城公主入藏传入西藏的。这以后，西藏的使节经常到长安。唐朝每代皇帝即位，藏王都要率表祝贺；藏王的立和死，也都向唐朝“报聘”和“报丧”。公元821年和822年，还先后建立了标志着藏汉两族友好关系的“甥舅联盟碑”和“长庆会盟碑”，这两块碑现在还立在拉萨的大昭寺内。可以说：从唐朝开始，汉藏两族的友好往来，除了经济和文化交流以外，在政治上也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为西藏民族参加祖国的民族大家庭奠定了基础。

到了十三世纪，元朝统一了西藏地方，西藏便划入大元帝国的版图，成为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十三世纪到十八世纪的几百年间，西藏的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都是由中国的中央政府陆续规定的，甚至达赖喇嘛的称号、地位和职权，也都是中央政府所授与和制定的。（达赖和班禅本来是十五世纪西藏宗教改革者宗喀巴的两位弟子，在他逝世之前，留下遗嘱，要这两位弟子世世转生，宣扬佛法。“达赖”是藏语。）意思是大海，说他的智慧像海洋一般的辽阔；“班禅”是藏语，说他的智慧和学问好像珠宝一样的珍贵，到明朝时代，西藏人民与祖国各民族的关系更密切了。1372年（明朝洪武五年），藏王甲拜派代表

到南京見太祖朱元璋，為大明帝國的建立祝賀，同時請求加封，此後，每代藏王即位都到北京請封。在十五世紀五十年代，西藏來北京進貢的人數每年有三、四百人；到六十年代，就增加到三、四千人，可見交往關係之密切。

公元1652年（清順治九年），五世達賴親自到北京朝貢，並請清朝皇帝加封。“達賴喇嘛”的封號就是從這時開始的（“喇嘛”是藏語純潔崇高的意思）。1717年（康熙五十五年），清聖祖封班禪為“額爾德尼”，“額爾德尼”是藏語“光明顯耀”的意思。西藏地方政府的職能和組織，“噶廈”和“噶倫”就是清朝乾隆皇帝規定的。

清朝末年和民國成立的初期，由於帝國主義極力策動西藏反動分子進行反對祖國的罪惡活動，使得西藏地方與祖國的關係受到損害。但是帝國主義和反動分子的陰謀活動並不能改變西藏民族和祖國各民族的關係，也不能把西藏地方從中國的領土上分割出去。1930年（民國十九年），國民黨派人到西藏去聯絡，西藏地方政府也派代表到南京，成立了西藏駐京辦事處。1933年，十三世達賴逝世，西藏地方政府根據歷代達賴逝世向中央政府報告的慣例向國民黨南京政府作了報告，國民黨也派人赴西藏祭祭。1940年，國民党中央政府又派人到拉薩布達拉宮舉行了十四世達賴喇嘛的“坐床典禮”。

從這些歷史事實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西藏在長期以來就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既非英國的領土，又非印度的領土，同時也不是什麼獨立的国家，事實就是如此，是任何人都抹煞不了的。

所謂西藏獨立是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分

裂西藏同祖國關係的一貫陰謀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西藏自治区籌備委員會代理主任委員班禪額爾德尼·却吉堅贊在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的發言中，以帝國主義過去侵略西藏的事實，揭露了印度的擴張主義分子所叫囂的所謂“西藏獨立”的真實面貌。他說：“西藏人民根據切身的經驗懂得，脫離祖國的必然結果，並不是什麼西藏的獨立，而是把西藏變作外國的殖民地 and 保護國。”

我們知道，所謂“西藏獨立”，首先是英帝國主義提出的。

英帝國主義為了把西藏變成它的殖民地，在1886—1888年和1904年，曾兩次對西藏發動了野蠻的武裝進攻，由於西藏人民的堅決抵抗，英帝國主義者兩次武裝侵略都沒有達到他們企圖佔領西藏的目的。於是，英帝國主義者就轉而採取陰險的手段。首先是在西藏統治集團內收買了一小撮民族敗類和甘願認作父母的反動分子，把他們培養成為英帝國主義的代理

人，企圖從西藏內部進行瓦解。其次是以反對清朝政府的民族壓迫為名，轉移西藏人民的鬥爭目標，由反帝轉為反對清朝政府和祖國人民。從那時起，西藏上層集團的反動分子中就出現了由英帝國主義一手扶持起來的班子，即所謂“親英派”。現在西藏的這個叛亂班子，就是英帝國主義培養起來的。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英帝國主義認為這是侵略西藏的大好機會，就唆使西藏上層集團中的反動分子舉行大規模的叛亂，趕走了清朝的駐藏大臣，血腥屠殺西藏宗教上層和貴族中的愛國分子。當時忠於祖國的九世班禪額爾德尼不得不逃往內地。英帝國主義趕走清朝駐藏大臣的陰謀實現後，緊接著第二步就任在外交上對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施加壓力，要它承認西藏脫離中國，變成英國的殖民地。在1913—1914年的西姆拉會議上，提出了要中國政府承認西藏的奴役性條約，其內容為：“中國政府與西藏有爭論時，由印度政府判決之”；“英國人得在西藏自由經商”；“西藏內政暫由印度政府監督；英國得派代表常駐拉薩”等等。很明顯，英帝國主義當時就是企圖利用它的殖民地印度來實現對我國西藏地方的殖民統治。但英帝國主義的這個侵略陰謀，激起了我國各民族人民，首先是西藏人民的極大憤怒，中國代表沒有在奴役性的條約上簽字。但英帝國主義並沒有罷休，在1918年，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機會，英帝國主義便唆使西藏反動分子派兵進入昌都、德格等地，英國駐華公使借此出面“調停”，並要求再次舉行“中英藏會議”，企圖迫使中國政府在西姆拉會議由英國提出的侵佔我西藏領土的條約上簽字，這個企圖由於遭到我國各族人民的激烈反對而作罷。但在以後的十幾年中，英帝國主義不但沒有停止干涉和破壞我國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間的正常關係的無恥活動，而且更加施展了殘酷和卑鄙的手段。

1933年，十三世達賴逝世後，由熱愛祖國的熱振活佛代行達賴的職務。熱振活佛努力密切西藏和祖國關係的行動，引起了英帝國主義和西藏上層反動分子的仇視，他們採用了最卑鄙的手段，壓迫熱振活佛下台，以英帝國主義的走狗反動分子大扎代理，然後井以“謀反”的假證據，逮捕了熱振，加以殺害。熱振活佛下屬的三個大活佛和許多喇嘛，有的下獄，有的流放，也通通遭到迫害。甚至與熱振活佛關係密切、心向祖國的十四世達賴的父親卻才讓也被反動分子毒死了。這就是有名的“熱振事件”。

“熱振事件”是帝國主義和西藏反動分子對西藏愛國進步人士的一次血腥迫害。自此以後，西藏統治集團里以大扎、魯康娃、羅桑扎西、夏格巴、拉魯、夏苏、索康等為首的一群最反動的帝國主義走狗掌握了西藏的統治權。他們肆无忌惮地進行背叛祖國的罪惡活動，企圖把西藏地方從偉大的祖國分裂出去，變

威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因而在1943年西藏地方政府在帝国主义唆使下突然宣布成立了“外交局”，表示西藏为另一个“国家”。但由于遭到包括西藏人民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反对，这一阴谋才未能得逞。

英帝国主义和西藏上层反动分子在上述阴谋失败后，又玩弄了另一诡计。1947年3月，英国在印度新德里召开“泛亚洲会议”，邀请亚洲所有国家参加，把西藏也作为一个“国家”邀请参加了会议。并把西藏佛教的“雪山狮子”宗教旗帜也当作西藏“国旗”而和其他各国的国旗悬挂在一起。在会场悬挂的亚洲地图上竟把西藏划出中国的版图，妄想借此造成西藏是“独立国”的既成事实。这一消息传出后，引起了我全国人民的巨大愤怒，中国政府提出了严重抗议，“泛亚洲会议”才不得不加以改正。

1947年10月，在美英帝国主义共同策划所谓“西藏独立”的指使下，西藏的反动分子组织了一个所谓“商务代表团”到美国和英国去和他们的主子商谈进一步反对祖国的活动。在1949年夏，全国快要解放的时候，帝国主义为了企图阻止我军解放西藏，指使西藏的反动分子制造所谓“驱汗事件”。随后在1950年1月，美国合众社还传出了西藏当局将要派出一个“亲善使团”分赴美、英、印度、尼泊尔和北京表示其“独立”的消息，以便为他们企图干涉我国内政而制造借口。我外交部发言人当即痛斥和揭穿了这一阴谋活动的实质，才未得逞。在1950年7月英帝国主义特务分子福特，在昌都毒害了我中央人民政府派去西藏劝诱接受和平解放的格达活佛。

所以，从以上所谓“热振事件”、成立“外交局”、“西姆拉会议”、“泛亚洲会议”、“商务代表团”、“亲善使团”、“格达活佛事件”，都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企图把我国西藏变为它的殖民地而干的卑鄙勾当。近代史上的所谓“西藏独立”，就是帝国主义，首先是英帝国主义制造出来的，是帝国主义侵略我国，分裂西藏同祖国关系的肮脏把戏。但是这些阴谋在藏族人民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反抗下都失败了。

印度扩张主义者的无耻阴谋与狂妄叫嚣

事实是清楚不过的了，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英帝国主义用过各种手段，也没有达到它分裂我国民族团结、变西藏为它的殖民地的目的。在英帝国主义碰得焦头烂额以后，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却没有得到教训，反而承继了英帝国主义的衣钵。干着破坏我国统一的罪恶勾当。他们和西藏叛乱分子，早就有了勾结，在这些叛乱分子发动武装叛乱之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大肆叫嚣，对我国进行恶毒的污蔑和阴谋活动。

印度的噶伦堡是西藏叛乱的中心，也是长期以来帝国主义和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对西藏进行阴谋活动

的中心。印度“闪电”周报最近一期刊登的“噶伦堡的真相”一文里报导，据一个同情叛乱分子的著名人士说：“所有的西藏人都把噶伦堡看作是第二个拉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反叛领袖差不多都在噶伦堡定居了一段时期或者最近呆在那里。前藏王鲁康娃在叛乱前一直住在噶伦堡，现在也仍然盘踞在那里。叛乱分子中的两个作战领袖安杜·宫普·塔希和萨杜桑·朗多就在几个星期以前到过噶伦堡，据该文所述，这次西藏叛乱也是策划已久的。早在一九五一年，就在叛乱分子安杜·宫普·塔希和南杰·多尔吉领导下，成立了叛军军事委员会，他们在印度、不丹和尼泊尔边境一带建立了一些总部，其中的一个重要总部就是在印度“东北边境特区”的契纳。去年夏天，一些叛乱分子的领袖又召集在噶伦堡的西藏居民开会，要求他们给叛乱分子提供物质帮助。更令人怀疑的是：印度“政治家报”早在三月二日就刊登了从噶伦堡获得的“达赖喇嘛将在三月十七日被诱拐出拉萨”的消息。这些事实证实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和西藏一小撮上层反动分子是有联系的。

西藏叛乱事件发生以后，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和某些政治家对叛乱分子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关心”，并给以“殷勤接待”。印度国大党总书记克里帕克尼夫人亲自担任了一个“招待和救济西藏难民”的委员会的主席，并且在她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所谓“帮助西藏难民的全国委员会”。印度总理尼赫鲁先生也亲自接见了以叛乱分子领袖鲁康娃·泽旺顿登为首的代表团。

另一方面，印度扩张主义分子又利用西藏叛乱，大肆污蔑我国，把我国的西藏说成是“独立国家”，把西藏叛乱说成是“正义事业”，把我国平息叛乱说成是“侵略”、“扩张”、“对邻国的威胁”等等。甚至连尼赫鲁的女儿、国大党的主席英迪拉·甘地夫人也否認西藏是中国的领土，把西藏说成是一个“国家”。

人民社会党的领导人梅达在孟买主持的“西藏日”集会上，把我国人民解放军平定西藏叛乱说成是对邻国的威胁，他信口雌黄地说：“今天轮到西藏，明天也许会轮到尼泊尔，后天也许会轮到我們。”另一个领导人瓦吉帕伊在德里的“公众集会”上也叫喊说：“假若西藏不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被中国并吞了，它将危及印度、尼泊尔、不丹和锡金的独立。”

这些扩张主义分子，所以如此地嚎叫，目的就在于干涉我国内政，为侵略我国西藏制造借口。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为了实现侵略我国西藏的卑鄙阴谋，还制造了两次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

四月十八日在印度提斯浦尔由印度外交官员斯·森散发的鼓吹“西藏独立”、污蔑我国的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据报道就是由印度外交官员参子制造而

用达赖喇嘛的名义发表的。

就在第一个声明发表的当日，路透社记者法列尔从新德里发出的报道说，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在同尼赫鲁总理的使节在邦迪拉举行了若干次长时间的会谈以后拟定的”。香港“晨报”和“星岛日报”也说，所谓达赖喇嘛的声明“是在尼赫鲁的包围、影响、甚至是限制之下表达其意见，这实在是无可諱言的事实。”“达赖的声明既曾通过印度外交人员而始发表，则已显然的是受操纵了。”甚至连印度报业托辣斯也在早些时候就报道印度官方人士说：“这位西藏的统治者至今是不愿向记者宣读这个声明的，但是他在被说服这样做。”

所以无怪乎这个声明不仅理屈词穷，謊話連篇，漏洞百出，而且連人稱、文件及所用的詞句都不是西藏文体，而是某种欧洲文件或准欧洲文体。因此，人們嘲弄这个声明“不是真达赖的話，而是許許多多假达赖的話。”

为什么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对西藏一小撮上层叛乱分子表现得这样“热心”、“同情”和“支持”，而对中国人民又如此恶意攻击呢？印度社会党的一个领导人梅达和印度社会党的領袖維拉揚已經不打自招地作了答复。三月二十九日，梅达在孟买主持所谓“西藏日”的集会时，居然說：“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当兒子被攻击时，母亲能够做一个不声不响的旁观者嗎？”又說：“西藏問題是影响印度的血肉問題。”这个招詞說明了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早已覬覦西藏，把西藏当作自己的領土了。

四月二十二日，臭名远揚的印度社会党領袖維拉揚在孟买的“印度支援西藏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公然宣称印度应当宣布“西藏是独立的国家”，英帝国主义对西藏的一切壟断权利应当由印度繼承。他說：

“根据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間的旧协定，后者拥有对西藏的宗主权，而前者享有發展那个国家的壟断权利”，而“在独立以后，印度成为这个壟断权利的繼承”。

这就是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打的如意算盘。

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印度扩张主义分子所以这样作，正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喜嘉鑑所說：“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他們居然忘怀英帝国主义霸占印度的黑暗时代的灾难，反而繼承其侵略衣鉢，欲取英帝国主义在西藏的特权而代之。”

但是，“萧瑟秋風今又是，换了人間！”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清朝、北洋軍閥或蔣介石統治的中国，中国人宰割的时代已經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英帝国主义既然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能够把西藏从我們祖國的大家庭中分裂出去，那么誰想要在今天繼續走英帝国主义的老路，只能是自找苦吃。目前，我們英勇的人民解放军已經迅速平定了拉薩地区的叛乱，又向山南地方挺进。我軍“出師十日，奔襲千里，踏破匪巢，一舉蕩平西藏山南叛匪，完全控制了山南地区和喜馬拉雅山北部所有边境要点”，至此，人民解放军已控制了西藏境内一切战略要点和国境綫。叛国分子的幻想像泡沫一样消逝了。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的野心，也永远不能得逞。西藏永远是中国的西藏。

中国人民是尊重我們两个亚洲偉大国家的友誼的，是誠誠维护我們两个偉大国家共同提倡的和平共处的五項原則的。我們絕不允許印度的扩张主义分子干涉我国的內政，破坏我国的民族团结，妄圖把我国西藏变成其他国家的殖民地或保护国。如果这些扩张主义分子胆敢繼續与中国人民为敌，我們全国各族人民將和他們斗争到底。

（上接第38頁）

一番艰苦奋战，終於又得到这最后一局的胜利，取得了世界冠军的称号。

比賽结束后，获得亚军的我西多紧紧地和我握手，向我祝賀。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代表队的同志們也热情地向我和我們全队道賀，他們对中国真是怀着亲切的友誼和崇高的同志感情。随后我便走向奖杯，領取了男子单打冠军的奖杯——聖·布賴德銀杯。

我所以能够在这次比賽中取得胜利，是一两年来党对我的教育和培养，这样就使得我在比賽中有坚定的信心，能够比較正常地發揮自己的技术；整个球队集体力量对我的帮助、支持，也起了極大的作用，使我

臨場战术能运用自如。我在这次比賽中，特别是团体賽时，就沒有完全打好，后来由于領导上的帮助，在单打賽时，才克服了缺点。这次的胜利，对我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使我深深感到，一个人要是沒有党的培养和教育，他是不可能得到成长的。也只有在党的教导下，加上自己的努力，才有可能在社会主义建設中做出貢獻。我給祖国人民尽了自己的一点責任，跟祖国人民所給予我的比起來是太渺小了。今后，我一定要防止驕傲，繼續努力鍛煉，虛心學習，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政治覺悟，在下屆在北京举行的世界乒乓球比賽中，为祖国做出更好的成績！

談1959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幾個問題

未 易

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一九五九年計劃，經過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的討論和通過，已經確定下來了。這個計劃一經公布，立即得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這是因為，這個計劃是在一九五八年偉大勝利的基礎上繼續大躍進的計劃；實現了這個計劃，將使我們在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上再邁進一大步。這個計劃的宏偉規模，必然會使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和主張民主的朋友們感到高興，而使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感到恐慌。

關於一九五九年計劃的主要內容和實現計劃的方法，周恩來總理和李富春副總理在他們的報告中已經說得很透徹。這里，只對計劃的主要內容作些解釋。

(一)

一九五九年計劃，是根據黨的鼓足干劲、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綫制定的。因此，它必然表現出高速度發展的特點。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工農業總產值將增長百分之四十，其中工業總產值（包括手工業的總產值，下同）將增長百分之四十一，農業總產值將增長百分之三十九；基本建設投資都將增長百分之二十六；鐵路貨運量將增長百分之三十六。這些百分數，是我國一九五九年經濟高速度發展的有力證明。

只看增長的百分數，許多人也許還不能明確地得到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高速度發展的概念。現在我們可以舉出一些絕對數字來說明。

一九五九年工農業總產值比一九五八年增長百分之四十，增加的絕對數字是八百二十億元，這個增加數，大体相等於我國一九五二年的工農業總產值。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工農業總產值一共增加了五百六十億元；（這是按一九五二年價格計算的數字；如果按一九五七年價格計算，數字還要低一些。）很明顯，一九五九年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是很高的。

再拿最主要的幾種工業產品和農業產品的產量來看。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我國將增產鋼六百九十二萬噸，煤一億一千萬噸，電力一百二十五億度，機床二萬至二萬五千台，棉紗二百四十萬件，同時將增產糧食三千億斤，棉花三千三百六十二萬

担，豬一億頭，等等。這些增產數字，也都大大地超過了第一個五年增產的總和。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二年，這些產品的增產情況是：鋼四百萬噸，煤六千四百萬噸，電力六十六億八千萬度，機床一萬四千三百台，棉紗一百零三萬件，糧食六百一十二億斤，棉花六百七十三萬担，豬五千六百多萬頭。我國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五年合計的鋼產量是一千六百六十七萬噸，而今年一年就將生產一千八百萬噸；五年合計的糧食產量是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三億斤，而今年一年就將生產一萬零五百億斤。

有人提出這樣的疑問：一九五九年計劃既然是一個繼續大躍進的計劃，為什麼工農業總產值及許多主要產品的產量，以及其他部門增長的百分數，會低於一九五八年增長的百分數呢？

對於一九五九年國民經濟的增長速度，應當進行具體的分析。各經濟部門和主要工農業產品產量在一九五九年的增長情況，不外是三类：一类情況是，一九五九年增長的百分數高於一九五八年增長的百分數，增加的絕對數當然也要大得多。屬於這類情況的，在工業產品中有電力、硫酸、化學肥料、貨車、棉紡機、棉紗、棉布、紙、食用植物油、糖等，在農業產品中有黃麻、洋麻、甘蔗、油菜子、大家畜、豬等。交通部所屬企業的貨運量，社會商品零售總額，也都是這樣。另一类情況是，一九五九年增長的百分數雖然低於一九五八年增長的百分數，但是增加的絕對數却大於一九五八年。在周恩來總理的報告中，已經舉出工農業總產值和鋼兩個例子作了說明。現在還可以拿鐵路貨運量作為例子：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長了百分之三十九，即增加了一億零六百多萬噸；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計劃增長百分之三十六，增加的絕對量却是一億四千萬噸。有許多工業產品和一些農業產品，也都是這類情況。再一类情況是，無論是增長的百分數，或者是增加的絕對數，一九五九年都低於一九五八年。屬於這類情況的不多，只是農業總產值，少數農業產品和少數工業產品。例如，農業總產值，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計劃增加三百四十億元，而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百四十三億元；糧食的產量，一九五九年比一九五八年計劃增加三千億

斤，而一九五八年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三千八百亿斤。从这里也可以看到，它們之間相差的数字并不大。

怎样了解大跃进，又怎样去看增长速度，这是一个重要问题。如果只看增长的百分数，以为既然是大跃进，后一年增长的百分数必须高于前一年，而且必须是成倍地增长，这种看法是不切实际的。由于国民经济每年都在发展，而且增长的速度都比較快，因此，每百分之一代表的数量。在每年都有很大的不同，如鋼的产量以一九五七年为基数，每增长百分之一是一万三千五百吨，而一九五八年为基数，每增长百分之一是一十一万多吨，后者为前者两倍多。基数大了，增加的绝对数相等，或者还要大一些，增长的百分数却会减低。这是比較容易理解的。我們在观察经济各部門增长速度的时候，不能只看百分数，必須同时看绝对数。

我們同时还应当看到，有一些部門和有一些产品增加的绝对量，也不可能一年比一年大，特別在农业方面是如此。由于全国五亿多农民在人民公社化以后發揮出更大的革命干劲，我国农业的生产量将一年比一年增加，不必用很长的时间，我們就能够做到丰衣足食，这是不应当有疑問的。但是，由于农业生产受天时、地理等自然环境的影响比較大，而且在目前还缺乏必需的农业机器和化学肥料，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一年粮食、棉花等农作物增产的数量，低于前一年增产的数量，也完全是可能的。根据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在基数年年增大的情况下，工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以上，农业生产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到二十，就已经不是一般的高速度，而是跃进了。因为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但资本主义国家通常不能达到，也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所少有的。

国民經济的高速度发展，是社会主义建設的普遍規律。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八，已经是相当高的速度。可是，当我們在一九五七年进行了思想战綫和政治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又超额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特别是找到了一条多快好省地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綫以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間那样的增长速度，已經不能适应客观的情况。在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的指引下，我国在一九五八年开始出現了一个全民的全面大跃进的局面。在一九五九年，我們将在过去一年偉大胜利和丰富經驗的基础上，繼續跃进，而且跃进得更好。对于这一点，是不应当有什么怀疑的。

但是，并不能因此認為，無論那一个经济部門的增长速度，可以按照主观的愿望无限地提高，可以把它規定到可能的極限。对于經過努力可以做到的事情，我們必須努力去做，如果不努力去做，就是一种保守思想，就会挫伤广大干部和群众的革命干劲。另一方面，任意地无限地提高计划指标，同样不是我們

应当采取的办法。因为那样的指标，是不可靠的，或者不能实现，或者勉强实现而带来一些副作用，同样会伤害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情緒和信心。因此，我們在拟定指标、規定任务的时候，既要考虑到各种有利条件，又要对可能遇到的困难作充分的估計；既要考虑到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考虑到广大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又要对物质技术条件进行反复的研究和計算，并且留有一定的“余地”。这样，我們才能作出比較正确的判断，把计划指标定在积极而又可靠的基础上。这样的计划指标，經過全国人民群众的努力，就一定能够完成和超额完成。

(二)

一九五九年计划，按照党所規定的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对国民經济各部門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的安排。

全面安排，首先表现在以下一些方面。在工业和农业方面，如前所說，工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十一，农业总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三十九。在重工业和輕工业方面，生产資料工业的产值将增长百分之四十六，生活資料工业的产值将增长百分之三十四。在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方面，工业部門的基本建設投資，分配給中央各部的約占百分之六十，分配給地方的約占百分之四十。在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方面，通过国家預算的基本建設投資总额，用于限額以上建設項目的約占三分之二，用于限額以下建設項目的約占三分之一；各地方，各企业自筹資金中投資基本建設的，将全部用于限額以下的小型企业的建設。在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方面，在一九五九年计划生产的鋼鉄、煤炭、洗煤、焦炭、銅和建築材料的产量中，已經包括一小部分用土法生产的产量在內；在这些部門，土法生产将在逐步提高技术的条件下得到推广。

由上面所列举的一些数字看来，一九五九年计划是貫徹执行了 在优先發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行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和輕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企业同时并举、洋法生产和土法生产同时并举的方針的。这样，我們就在主要方面解决了国民經济按比例发展的問題。

国民經济各个部分之間的联系是很密切的，关系是很复杂的，执行了上述一套“两条腿走路”的方針，当然并不能把一切比例关系的問題都解决了。但是，貫徹执行这一套方針，就使我們有可能解决国民經济發展中最基本的比例問題，不仅各个主要的部門能够彼此协调地发展，避免發生严重脱节的現象，而且将有可能在各个部門互相促进的情况下使整个国民經济得到更快的發展。去年的全面大跃进就是証明。

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輕工业在优先發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同时得到发展，是使国家建設和人民生活的

关系获得妥善解决的主要保证。我们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候，必须兼顾人民生活；我们在不断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部分的时候，必须注意到消费部分，使积累和消费保持适当的比例。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基本途径，就是要适当安排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的生产，相应地安排以扩大生产为目的的基本建设。有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就可以保证国家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而有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增长，就可以保证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因此，只要切实完成一九五九年的重工业、农业、轻工业的生产、建设计划，那么，国家建设和生活的关系也必将得到更好的解决。

在全面安排中，除上面所说的以外，当前需要解决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原料、材料和燃料、动力工业同加工工业的关系，一个是生产、建设和运输的关系。

从去年夏季以来，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供应都比较紧张，这种状况，是国民经济大跃进、需要量激增的反映。这就要求我们在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时候，首先注意原料、材料工业的发展，注意燃料、动力工业的发展，并且继续执行以钢为纲的方针。因为有了更多的原料、材料，首先是钢铁，再有更多的煤炭、石油、电力，我们就能够制造更多的机器，并且把机器都开动起来。在一九五九年计划中，已经尽可能地提高了钢、铁、铜、铝、水泥、木材、煤炭、原油、电力、硫酸、纯碱、烧碱的增长速度。为了保证原料、材料、燃料、动力的迅速发展，在一九五九年的基本建设计划中，已经适当增加了这些部门的投资。

运输能力不足，同样是国民经济大跃进中出现的新的问题。有少数产品，如木材和原油，甚至因为一时运不出来，不得不适当降低生产指标。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九五九年计划规定新建铁路干线、复线、支线和企业专用线等五千五百公里，同时规定了修筑公路、改建港口，增加车辆和船只及其他设备的指标。一九五九年机械工业的生产，将为运输业提供五百五十台机车、二万七千至二万八千五百辆货车和必要数量的汽车、船舶，以及其他有关的设备。

如上所说，一九五九年计划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作了全面的安排，那么，是不是这个计划就没有重点了呢？显然不是这样。一九五九年计划的重点是很突出的。这个计划的中心，就是钢一千八百万吨、煤三亿八千万吨、粮食一亿零五亿斤、棉花一亿担四项指标。国家计划对各方面进行全面安排，正是为着更好地保证四大指标的实现。

计划必须有重点，这是十分重要的。重其所重，轻其所轻，才能表现党和国家明确的建设方针。没有重点，就等于没有建设方针，或者方针不明确。重点和一般的关系问题，实质上是大局和小局的关系问

题。因此，在执行计划的时候，必须遵守小局服从大局、局部服从整体、首先保证重点建设的原则。任何企业单位，都应当不折不扣地完成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而且应当按照轻重缓急的情况，对各项任务进行“排队”，首先保证完成主要的任务。

(三)

速度很高和规模宏大的一九五九年计划，是能够实现的。我们有着实现一九五九年计划的许多有利条件。大家熟知，我国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有巩固的社会主义制度，有党和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有勤劳勇敢的六亿多人民的革命干劲，以及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兄弟般的援助，等等。这些有利条件，过去存在，现在也还存在。不但如此，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我们又有了过去所没有的许多有利条件，这类有利条件是：比往年强大得多的物质技术基础，具有无限生命力的人民公社，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对大跃进的經驗，党对于经济工作的领导的加强，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经过一九五八年的伟大实践，已经更加趋于完善，更加深入人心。所有这一切，都将对于一九五九年的继续跃进起重要的保证作用。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新胜利抱着无限的信心。

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决不是说不要在战术上重视困难。恰恰相反，只有在战术上充分重视困难，并且努力一个一个地把困难战胜，才能做到在战略上藐视困难。应当看到，一九五九年计划规定的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在我们面前，某些原料、材料供应不足，少数地区电力供应不足，农村劳动力感到紧张，某些地方气候条件不好，这些困难，已经出现或者开始出现。还有一些现在难以预料的困难，例如比较严重的自然灾害的袭击，也并不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对于各种困难，我们都必须有充分的精神准备，并且用充分的努力加以克服。

为了战胜困难，保证一九五九年计划顺利地实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已经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战斗性的号召：立即开展一个增产节约的全民运动。在这个增产节约运动中，由于全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公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各种增产措施的实现，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向前推进，必将大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发挥人力、物力和财力方面的巨大潜力，使一九五九年计划的实现获得可靠的保证。全国的青年，无论站在那一条战线上，无论在农村或者在城市，都应当立即热烈地投入这战斗，成为增产节约的先锋队，贡献出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在生产、建设、运输、商品流转各个方面，在工作中和学习中，做出更大的成绩，迎接我们伟大的国庆十周年！

湘江的怒吼

——“五四”前后毛主席在湖南的革命活动

周世釗



驅張运动的爆發和胜利

提起張敬堯，湖南人民沒有一個不切齒痛恨的。一般人認他為毒，比他為虎，恨他更遠在湯壽潛、傅良佐一些統治湖南的北洋軍閥之上。他從1918年的夏天打敗譚浩明，做了湖南督軍兼省長之後，沒有做過一件好事情。他放縱他所帶來的“北兵”到處奸淫、虜掠、放火、殺人。他們到哪裏，哪裏的商人就得停止營業，農民就逼得不敢種田。縱在風雨之夜，也要藏躲到深山密林中去；如果沒有躲藏得及，落入了他們的手中，就一定要受到凌辱、劫奪和種種難以想象的痛苦。常常弄得几十里內空無人烟。長沙城外內和附近郊區，也常常發生商店被搶劫、婦女被輪奸、居民被慘殺的案件，見之于長沙報紙上記載的，一年之間不下五、六十起。他又想盡一切辦法刮錢。除大量販運鴉片烟和巧立名目加收鹽稅之外，又設立裕湘銀行，日新銀號、濫發紙幣。單以銅元票來說，就發出一萬萬串以上，銀元票發行量也極大。紙幣既不受用，自然就一再貶值，一塊錢買不到三根油条。教育經費常拖欠五、六個月不發，公立學校的師生，常至斷炊。弄得學生退學，教師罷課，學校紛紛關門。他的三個兄弟敬聲、敬禹、敬湯，倚仗兵勢，助紂為虐，招權納賄，橫行霸道。人民群眾這樣形容他們：“堂堂乎張，咷咷禹湯。一二三四，虎豹豺狼。”大家發出悲痛的呼聲：“張毒不除，湖南無望。”

毛主席看到張敬堯的罪惡之日俱增，人民的痛苦到了不可再忍的程度，于是在“湘江評論”被封後就開始進行驅逐張敬堯的秘密活動。他領導被封反組的湖南學生聯合會，借檢查日貨，以堅持反日愛國運動，並與張敬堯對抗。到了1919年12月2日，因驅逐張敬堯兄弟壓迫人民的愛國運動，阻止焚燒日貨，侮辱學生代表，於是大規模公開的驅逐運動爆發了。

早幾天，湖南國貨維持會學生調查組在火車站起獲了同仁裕等各家所購進日貨布匹、南貨，數量很多。

經評議部議決，於12月2日舉行遊行示威後，將所起獲的日貨全部焚毀。

這天氣晴朗。我們修業學校的中小學的和教師，剛吃過早飯就急忙整隊出發，去參加示威遊行。冬天的太陽照在年輕人緋紅的臉上，照出他們內心的憤怒和興奮。我們學校的隊伍跟着遊行大隊，走過東長街、青石橋、八角亭、披子街、西長街，向教育會坪前進。大隊的前面，由軍乐队引導。一些身強力壯的糾察隊抬着要焚燒的日貨走在軍乐队後面。男女學生約五千人又走在糾察隊後面。大隊的兩邊，學生用手攏着用日貨布匹匹配的長布條，正象出喪時送葬人執紼一樣。隊伍走過洋貨店門口時，“抵制日貨”，“打倒奸商”的口號叫得特別响亮。洋貨店懸挂放盤贈彩，七折八扣等旗幟，都被取掉。下午一時，遊行示威的隊伍已經齊集在教育會坪。一大堆日貨擺放在坪中央，學生和旁觀的將達到萬人，圍繞着日貨站成多層的圍圈，等候着日貨的焚毀。

正当學聯負責人和各校學生代表站在特設的台上講演焚毀日貨的意義時，張敬堯的參謀長張敬湯穿着長袍，騎着馬，帶着一營兵，一連大刀隊，沖進坪中，指揮他的兵從內外兩面將學生緊緊圍住。他自己向台上一站，就被口大罵：“放火、搶東西，就是土匪；男學生是男土匪，女學生是女土匪。對土匪還要講道理么？打啦，打啦，就是道理！”講到這里，他叫大刀隊壓着台上的學生代表跑下，並打他們的耳光。他又在台上頓足大呼：“坪中的學生都回去，不許停留！”几百個兵立即用槍上的刺刀朝着學生的胸際，逼着他們離開會場。我們的隊伍和全體學生一樣，帶着憤怒的心情回到學校。大家覺得今天受了極大的侮辱，難堪到了極點，但不知怎麼辦才好。

當天晚上，毛主席約集了學聯負責人和一部分學校的學生代表商量發動全省學校總罷課，聯絡省內省外的力量開展驅逐張敬堯的運動。他向大家分析了當時的形勢，認為驅逐具備了有利條件：青年學生的憤怒，全湖南省人民的憤怒，全國輿論的抨擊，直皖

革命活动进入了新的阶段

两系軍閥咬狗的斗争，都把張完全陷于孤立，陷于四面楚歌之中；这回压迫爱国运动，侮辱学生，更是引火自焚的举动。我们必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坚决把張敬尧赶走，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湖南三千万人的生命。

学联的干部連日四处活动，醞釀学校罢课。但有一部分教师和学生对罢课、驅張抱着怀疑观望的态度；有的主張驅張，但不主張罢课。针对这种情况，毛主席认为第一步要說服教师，第二步要說服学生。于是，他和湖南健学会一些骨干分子如陈澧霖、張孝敏、易培基、赵鸿鈞等商量，由健学会召集会员开会，统一对罢课驅張的認識。健学会的会员多半是各校比较有威望的校长、教师，由他們發動其他教师，进一步發動学生，容易發生效果。他又在学联召开的各校学生代表会上講了話。他說：“反对張敬尧的斗争，就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就是反对美国政府、封建軍閥的斗争，也就是此时此地的具体的爱国行动。平时大家都贊成爱国，贊成改造社会，现在就到了实际行动的时候了！”他激动的感情，坚定的语气，使大家感动，对表決罢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除福湘、艺芳两女校外，长沙全体专门学校、中学、师范和一部分小学相繼罢课，学联代表中学以上的学校的一万三千多学生發布了“張毒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宣言。

接着毛主席又积极研究驅張的具体活动。经过几次討論后，决定組織驅張代表团，由教师代表率領学生代表赴北京、衡阳、常德、郴州、广州、上海等处，进行請愿和联络。毛主席是赴北京代表团的主持人。

在北京一段時間，恰是冰雪滿街、寒風凜冽的天气。毛主席和代表們每日奔走各处，联络湖南学生、湖南議員在湖南会馆开了一次大会，使大家在驅張請愿書上簽了名。但当他們向北洋軍閥內閣总理請愿时，被拒絕接見，毛主席和代表們好几次在新华門前生了几点鐘的冷板凳。

毛主席觉得向軍閥政府請愿，决不会發生实际效果，他們来北京請愿，不过是向全国人民宣傳張敬尧的罪惡，表示湖南人民的决心，以取得輿論的支持而已。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他分派一部分代表南往衡阳、郴州，利用軍閥間的矛盾，促吳佩孚、譚延闓驅張。他自己于1920年4月到上海，联络旅居上海的湖南人，要把驅張运动进行到底。这时候，他的生活很艰苦，靠洗衣服吃飯。但接送衣服要坐电車，洗衣服所得又半耗于电車費。他不以为意，除日夜作驅張活动外，还和在上海的新民学会会员商討了改革会务的問題。

这年6月間，張敬尧因吳佩孚从衡阳撤兵，譚延闓的湘軍长驅直入，不能在湖南立足，倉皇逃往湖北。驅張运动至此胜利結束。

1920年春，毛主席因領導驅張請愿团停留在北京时，苏联政府已發出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的通知，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的經典著作的中文譯本已經出版。十月革命的炮声已經在中国發生深广的影响。毛主席在北京的几个月中，和中国首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李大钊、邓中夏諸同志有了密切的联系，并且用心閱讀了他們所介紹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書籍。从此他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曾把这段时间的情形这样写出：“在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間，讀了許多关于俄国革命的書籍。我热烈地搜寻一切那时能够找到的中文的共产主义文献，使我对马克思主义建立了完全的信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正确理論。从此以后，从沒有动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論上也在行动上，我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驅張运动胜利結束之后，毛主席于1920年的7月回到长沙。他担任了第一师范附屬小学的主事，后来又兼教了师范部一班国文。他利用了这个社会地位，在湖南进行宣傳马克思主义，建立共产党組織的活动，相繼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組，社会主义青年团和长沙文化書社，并进行联系工人农民的工作。他的革命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这时无政府主义者在长沙早有一些活动。青年学会、青年俱乐部、湘雨詩社、湖南劳工会、健康書社等都是他們的組織。他們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者，主張極端自由，不要政府，不要法律，不要領袖，廢除一切帶有强制性的制度；又主張平均財富，一切平等。他們正如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所說，“想在二十四小时内就消灭国家，却不懂得实现这种消灭的条件”。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很投合于一般小资产阶级的脾胃，因此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在一些青年学生和教师中間頗为泛滥。毛主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傳时，到处要和这种思想作斗争。他首先在第一师范組織了崇新學社，以學習马克思主义、爭取无政府主义分子为中心活动。又把总工会的組織者黃愛和羅人銓爭取过来，对劳工工会会员多方进行宣傳教育工作，都收到很大的效果。

此外，毛主席發起的星期同乐会，虽是文娛活动的組織，对宣傳马克思主义和爭取无政府主义分子的轉变，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从1920年的秋天到1921年的秋天，和毛主席在一起作革命活动的，除新民学会会员外，还有马克思主义小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联系最多、往来最密的十多人，都是活力充沛、干劲十足的青年。平日各有工作，分途活动，大伙很少有机会齐集在一起，因

此大家覺得不滿足。毛主席看出了大家的心意，同時為了把大家聚在一起研究一些革命鬥爭的策略，提議組織星期同樂會。十多人排好次序，每到星期天，依次由一人負責召集，到長沙近郊名勝地方聚會。如天心閣、水陸洲、開佛寺、碧浪湖、望湖亭、朱家花園……就是他們常常聚會的地方。

他們到了這些地方，盡情游覽、談笑，會講故事的講故事，會說笑話的說笑話，愛好文學的作詩作詞。目的就是要大家敞開胸懷，縱情歡暢。但個人的思想問題和工作、學習上的問題，也可以提出和大家討論，或和少數人交換意見。這也無非要使大家解除思想上的疙瘩，蕩漾心情上的煩愁。玩夠說够之後，召集人還要辦點可口的飯菜讓大家吃個飽。

中秋的夜晚，他們十多人坐着划子，到湘江中流去賞月。對着當空的皓月，迎着輕拂的涼風，興會淋漓，身心俱爽。一個小小的划子，載着他們的歌聲笑聲，載着他們壯志豪情，圍着長達十里的橘洲打圍圈。直到夜闌人靜才回家。

他們覺得在緊張勞動之後，得到這樣休息、調節，不但有益於身體的健康，還可以鼓舞革命的勁頭，提高工作效率。星期同樂會是一個有益的組織。

除了充分利用一週一次的聚會時間使各人的身心得到休息、調節之外，他們還抽出一定的時間，對於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宣傳，提出一些疑難和問題，進行討論。並且由理論水平較高的同志對大家的意見加以分析、總結。這對於提高大家革命理論水平，堅定大家革命鬥志都有很大的幫助。有時，又通過個人友誼關係，邀請信仰無政府主義的分子參加集會。在共同娛樂、敘談中間，以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論點啟發、影響他們，使他們逐漸認識無政府主義思想的錯誤，因而被爭取過來，成為相信馬克思主義的人。所以星期同樂會不但有娛樂作用，而且就是一種很有意義的革命活動。

毛主席回憶這時候的情景，曾寫了一首“沁園春”的詞：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携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揚文字，粪土當年萬戶侯。會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這首詞不但欣賞麓山湘水的秋色宜人，而因物興感，充分表現了他英雄豪邁的氣概，爽朗闊大的襟懷。“指点江山，激揚文字，粪土當年萬戶侯”，正

是他這時候恰如其分的寫照。他的頭腦中沒有絲毫個人名利得失的塵滓，所以能夠上天下地，自在翱翔；往古今來，略無挂碍。這種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使他在追求真理、組織革命的鬥爭中，戰勝一切艱苦、阻礙、危難和無數頑強的敵人，而勇往直前，毫無所懼。

湖南人民的精神糧站

五四運動後，新文化的宣傳、鼓動，很快就在全國各地蓬勃展開；新的報刊、書籍的發行和銷售，數量大大增長。而湖南在張敬堯統治時期，一切新思想和新事物都被禁遏、摧殘，新書新報很不容易輸入。同時，張敬堯兄弟又求神打醮，大修廟宇，公開提倡迷信。湖南青年籠罩在這種烏煙瘴氣下面，思想覺悟自然不容易提高。

毛主席在北京、上海作驅張運動時，就計劃張敬堯驅走後，要在湖南大力開展新文化運動。1920年7月他由上海回到湖南後，認為驅張運動已勝利結束，當時最迫切的工作是創設書店集中販賣新書報，向全省青年傳播新思想和新文化。他立即大力籌劃了這件事。為了籌集資金和擴大影響，他爭取當時長沙教育界、新聞界、工商界一些有聲望的人物共同發起創辦一個文化書社。又請當時湖南督軍譚延闓為書社寫了招牌。

毛主席親自寫了一個“發起文化書社緣起”送到報紙刊出。他說：“沒有新文化，由於沒有新思想；沒有新思想，由於沒有新研究；沒有新研究，由於沒有新材料。湖南人現在腦子飢荒，實在過於肚子飢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願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科新雜誌，以充青年及前進的湖南人研究的材料。”

開辦書社的資金是不容易解決的問題。毛主席與一些新民學會會員和長沙教育界一些上層人物商量，大家同意每人投資十元，第一次共籌集了四百餘元。不久又向各方籌集了一點，共達到一千元。由於資金不多，書社最初一段時間內經售的書不到兩百種，雜誌四十多種，報幾種。都是隨到隨完，遠不足以滿足買書人的需要。

書社為了積累資金，擴大營業，極力節省開支，只用兩個營業員。營業員的工資也很微薄，實際上只够吃飯。所租朝宗街三間作社址的房子也花錢不多。社里的賬目隨時清理結賬，毛主席常常親自協助核算，使它絲毫不亂。由於採取了這些措施，社里逐漸有了一點積累，營業的範圍也逐漸擴大。1920年至1921年春，與省內外發生書報營業關係的達六、七十處。當時與省外營業來往最多的，有北京的晨報社，北大出版部，北京學術講演會，上海的泰東圖書館，亞東圖書

館，廣東的新青年社，武昌的利群書社。後來營業更加發達，全國各地出版的新書新報，特別是共產黨、青年團的機關刊物如“响導”周報，“中國青年”、“先驅”等，更是大量推銷。這也是大量推銷。

這時期銷售最多的書是“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農報小說”等；銷售最多的雜誌是“勞動界”、“新青年”、“新教育”、“新生活”等；銷售的報紙只有“北京農報”和“時事新報”，每天也達到四、五十份。為了便利買書人，在平江、瀏陽、衡陽、邵陽、寧鄉、武岡、瀘浦等處設了文化書社的分社。長沙城內則在一師、楚怡、修業諸校設了代銷處。負責創設分社或代銷處的，多半是新民學會會員。

文化書社被人稱道的特點有三：一是販運迅速。由於書社與京滬各地書報業聯繫緊密，所以國內書報很快就能運到長沙，達到讀者手中。二是購書便利。書社營業員雖少，但常將書報送上讀者的門。很多學校的學生也因為到處有代銷處，每每不出校門就可買到所需要的書刊。三是工作人員服務態度好。除耐煩細心為讀者服務外，還常代人向外埠購買所指定購買的新書。因此，全省廣大知識青年、革命工人和各界進步人士多半都到文化書社買過書，有過往來。

文化書社從1920年9月開始營業，直到1927年馬日事變時才被國民黨反動派所搗毀。在這期間，它搬了幾次家，第一次由朝宗街遷到貢院東街，第二次由貢院東街遷到水風井。它的創設和發展，是湖南人民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上一件大事。它對於在湖南境內廣泛地傳播馬克思主義思想和推動新文化運動，起了極其重大的作用。國民黨反動派雖然能夠搗毀它的軀殼，但對於它在宣傳革命思想、推動革命事業上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永遠也搗毀不了的。

知識分子與工农結合的一種形式

創辦工人夜學，平民學校（日校或夜校）和各種補習學校，是五四運動前後進步的知識分子與工农結合的一種普遍形式。毛主席也曾運用過這種形式。

遠在五四運動以前，毛主席在第一師範和同學們談教育問題時，就曾經談過這樣的話：“有錢的人就能受教育，從小學到大學，沒錢的就被關在學校門牆之外，做一世光眼瞎子，這是合理的麼？”“依據國家狀況，社會中堅力量實是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但他們沒有機會受到教育，覺悟不能提高，知識不能增進，問題實在太嚴重了！”

第一師範附近有銅元局、黑鉛煉廠、電燈公司等工廠，也是鐵路工人、人力車夫、蔬菜小販和其他苦力聚居的地方。住在這些地方的人多半過着朝不保

夕、飢寒交迫的窮苦生活，自然也就談不上受教育、學文化，因此，絕大多數是文盲和半文盲。這種情況，毛主席平日從觀察、接觸和訪問中已很熟悉，因而更同情他們的處境，覺得應該設法把它改變。

1917年的秋天，毛主席被選為一師學友會總務（主席）兼教育研究部部長。在教育研究部開第一次會議時，他倡議讓第一師附屬初級小學內創辦工人夜校，吸收附近窮苦工人入學。這個倡議，得到全體部員的同意，決定積極籌備辦理。他用白話寫出招生廣告，在街上張貼。廣告中這樣寫道：“列位最不利的是什麼？就是俗話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才能寫得幾个字，算得幾筆數呢？……我們第一師辦了一個夜學，這個夜學是專為列位工人設的。從禮拜一起至禮拜五止，每夜上課兩點鐘；教的是寫信、算賬，都是列位自己時常要用的。……講又歸我們發給，並不要錢。夜間上課又于列位工作無妨礙。若是要來求學的，請趕快於一禮拜內到師範的號房報名。……”這種淺俗、親切的廣告貼出後，沒有幾個人來報名。後來又用大張的紙寫出，貼在街頭最顯眼的地方，來報名的還是極少。毛主席研究了他們不來報名的原因，組織同學十多人，攜帶招生廣告，挨家挨戶去勸學，詳細向他們宣傳參加學習的重要。三天後，就有一百二十多人來報名。陸續要求報名的還很多。

夜學教學，必須適合學生需要，適合學生接受水平，講義內容必須與學生日常生活有密切關係。毛主席根據他與夜學教師們共同決定的這幾項原則，親自參加編講義、教課，不斷研究改進教學方法。每天由夜學管理員填寫夜學日志，詳記每天授課、訓話的內容和教學生活各方面應改進的問題。從夜學開辦時起，有很多日子的夜學日志是毛主席親自寫的。他的工作熱情和幹勁，鼓舞了所有在夜學教課的同學，大家都堅持了教學工作，把夜學辦得使學生很滿意，就在時局不安靜的時候也能照常上課。

毛主席又考慮工人們的困難，規定上課時穿什麼衣服、穿不穿鞋聽便，不求美觀整齊。遇戒嚴時期，就請警察保護工人夜間在街上的通行。因此學生都安心學習，進步很快。

1918年毛主席從一師畢業後，工人夜學因無人負責就停辦了。到1920年毛主席擔任一師附小主事，考慮要開展工人運動，必先提高工人覺悟，認為工人夜學的形式有大加運用的必要，因此在附小的初小部辦了平民夜校。他把這個夜校看得很重要，他的工作雖極忙，仍親自主持夜校的教學業務，並常利用課前課後，與學生個別談話，在了解他們的勞動、生活各方面的情況的基礎上，向他們進行革命思想教育。不管严寒酷暑，不管雨夜風宵，他從夜校回到附小常常在

半夜大家就寢以後。

為了使社會失學青年特別是工農子弟得到受教育的機會，毛主席又在高小部辦了一個補習班，招收十八歲以上的失學青年，以補習國文、算術為主。所選國文教材，多是“五四”以來的進步文藝作品。這些學生多來自農村，年齡較大，對社會一些不合理的事實了解較多，因而接受新事物也比較敏感。在他們入學不久的日子裡，居然能寫出長篇大論的文章，大膽地反對舊禮教，反對軍閥，反對帝國主義。毛主席在檢查他們的學習成績時，感到很滿意。但另一方面，由於他們多出身農民家庭，很少或沒有度過學校生活，到處表現得與師範部學生不同。每當師範生在禮堂舉行講習會、報告會，或節日集會，他們有的腳上拖着破鞋，手裡拿着油條、燒餅，在一邊吐嘈邊聽講。一些師範部的師生看不順眼，要求易校長取締，易校長以告毛主席。毛主席說：“這種形式似乎不大重要吧！”

由於毛主席這樣關心勞動人民的教育，這樣千方百計解決他們的學習問題，一些在夜校和補習班的學生都覺得他是他們最好的老師和朋友。第一師範附近的窮苦人民，認識他是辦夜校的毛先生，對他表示非常親切和尊敬。他也由此取得了一些聯繫工農的經驗，並進一步和勞動人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走俄國人的道路

到1921年的夏天，新民學會的成立剛滿三年。雖然只是短短的三年，但由於毛主席積極熱情的領導，已經做了不少的事情。最重要的是：在湖南推動了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組織了幾百個男女青年到法國去，新民學會也去了十多人。在開展反日愛國運動、新文化運動、驅逐張敬堯運動中，新民學會的會員常常是尖兵，是骨幹，常常站在艱苦戰鬥的最前線。這些參加了戰鬥的會員不斷受到毛主席的啟發、幫助和鼓勵，不斷受到實際鬥爭的鍛煉和考驗，認識水平、政治覺悟、鬥爭意志也更加提高、更加增進、更加堅定。

去到法國的十多個會員，踏上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大陸，親自看到了大戰創痕，也受到了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影響，思想上的震動和變化都很大。他們在做工和學法文之餘，擠出所能擠出的時間看書看報，想對自己所接觸的新問題、新世界，有透徹、明確的了解。蔡和森同志尤為突出。他於1920年初到達法國後，因病沒有進工廠工作，即依靠字典的幫助，用猛看猛譯的方法，經過五、六個月日日夜夜的辛苦工作，把有關世界大勢、俄國革命的情況以及社會主義的各種派別，基本搞清了。他得出的初步結論是：中國的革命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他的主張得到在法多數會員的贊同。但也有一部分會員，懷疑俄國十月革命的

經驗，主張以教育為工具的溫和革命。1920年7月6日到10日在法國蒙達尼開了五天會，到會的十四人，在會上就展開了這兩種主張的爭辯。

這時候，毛主席因領導驅張運動第二次到北京，熱烈搜讀共產主義的文獻，在理論上和行動上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不久，由北京到上海，再回長沙，在長沙開展馬克思主義的研究和宣傳，並進一步準備建立共產黨的組織。從1920年5月到1921年1月的八個月中，他和蔡和森同志往返的六、七封長信，都集中討論了改造中國和世界應該走什麼道路的問題。蔡和森同志認為：“社會主義實為改造世界的對症之方，中國將來的改造，完全適用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他又在一次信中向毛主席這樣提出：“我願你準備做俄國十月革命。”毛主席對他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而對於另外一些會員主張用和平手段、教育方法，使有產階級覺悟，從而謀到全體的幸福的主張，則認為“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

為了討論會務和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問題，1921年的1月間，毛主席約集了留在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在朝宗街文化書社連開了四天的會。到會的會友閱了留法會友來信後，就會務開展的意見，改造中國和世界的主張，以及個人學習、工作的計劃作了詳盡的發言，並互相提出批評和建議。最後，毛主席就各人的發言作了全面的分析。他除強調改造中國、改造世界必須走俄國人的道路之外，還指出：會員有出國的，有留本省的，有求學的，有教書的，各人的情況雖然不同，但奮鬥的目標和步調應該一致，應該統一在學會所提出的要求下面，應該使個人的努力與會務開展緊密結合起來。他不贊成留長沙的會員都去法國，也不贊成大力向南洋發展的主張。他認為長沙是會務開展的主要基地，不要把它輕易放棄。他說：“我就不想離開長沙，我願意以較長久的時間在這裡為學會建立比較穩固的基礎。”他的講話，使許多會員澄清了各種錯誤的想法，明確了努力前進的方向。這次會議的時間雖長，又值寒風飄雪的天氣，但會員的精神始終是飽滿而興奮的，仿佛就已投身於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大戰場。

由於毛主席一直就注意了思想領導工作，新民學會會員的絕大多數都能跟著革命形勢的發展，堅定地為改造中國、改造世界的遠大目標不懈奮鬥。他們在勝利開展了長沙方面五四運動的各種活動的基礎上，做好了建立黨組織的準備工作。除開一小部分人落了荒、掉了隊以外，新民學會會員的大多數都加入了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為走俄國人的道路、走社會主義的道路，繼續進行艱苦的戰鬥。

（轉載中國青年出版社“光輝的五四”，本文略有刪節）

跟隨少奇同志返回延安

呂
振
明

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事了。一九四一年黨中央調少奇同志回延安，華中局決定我們一百多名幹部隨行。到了山東分局研究交通情況和沿途敵情以後，認為大隊幹部隨行不容易通過，少奇同志便決定讓絕大部分人員由東海、諸樊轉回華中，只留我們幾個人和警衛班隨行。

我們能跟隨少奇同志回延安，心里有說不出的高興！這不僅因為能和少奇同志在一起，還由於能回到延安，見到毛主席。當時從華中通往延安的路上，要通過日偽和國民黨頑固軍的一百零三道嚴密的封鎖綫，要越過冰雪掩蓋的晉西北山區，要在爬山涉水的艱苦的夜行軍中度过一年的春夏秋冬。出發前，華中局指示我們：這是一個極端嚴重而冒險的長途行軍，每個同志都要把跟隨少奇同志安全回到延安，作為一個嚴重的政治任务。

一九四二年三月十八日晚上，我們從蘇北阜寧單家港起程，連少奇同志在內，大家都化裝成老百姓，就這樣，我們開始了夜行日宿的長途跋涉的生活。

這仲春之夜，田野里洋溢着花草的清香，使人感到心曠神怡，但誰知就在祖國這樣美麗的土地上，却分布着敵人一座座阴森森的碉堡，一道道嚴密的封鎖溝和封鎖牆。在鐵路、重要公路兩側險要地方的封鎖溝，每每有幾丈寬、幾丈深，里面放滿了水；封鎖牆每每高過一人以上，在溝和牆的每個通口，都有一個敵、偽軍日夜駐守和巡視的碉堡，敵人就利用它來分割我們抗日民主根據地。但是，由於我黨、我軍到處都和群眾建立起密切的聯繫和依靠群眾，這些人為的障礙，絲毫也阻擋不了我們的活動，更吓不倒我們。有時，少奇同志和我們都必須隨身攜帶鐵錘，將又寬又深的封鎖溝，錘開一個口子，以便人馬爬過；有時要從齊腰深的水溝里涉水前進。在魯南魯西，從漢奸和大地主的莊子下經過時，它們的碉堡里也不時盲目地放射土炮和槍彈。每逢這樣緊張驚險的場合，少奇同志總是顯得那麼沉着、安詳，告訴大家：“不要怕，夜晚的槍彈打不着人。”我們每個人都覺得在少奇同志身邊，無論碰到的環境多么艱苦，多么危險，都是能夠克服的；他隨時隨地特別在險惡的場合，都給予我們以百倍的信心和勇氣。

在過第一、二道封鎖綫、隴海鐵路東段和其南面的公路以前，少奇同志詩誦告誡大家：每人隨身帶一盒火柴，萬一遇到敵人襲擊或中了埋伏，首先趕緊將文件燒掉，無論如何不容許遺落到敵人手中；不要讓敵人活捉，寧可犧牲自己也不能使革命再受到其他損失。

二

少奇同志對每個護送或是充當响導的同志及群眾，都給予極大的尊重和信任，他自己在行軍中總是作為普通的一員。七月，我們離開山東分局和渡過沂河、澆河以後，當夜進入魯南的冊山地區。這夜沒有月亮，漆黑的天空落着蒙蒙細雨，庄稼地里浸滿了水，路上的溝渠又多，只好摸索着前進，準備在天亮以前，走出敵占區，進到我們魯南抗日游擊區。

由於給我們帶路的同志迷失了方向，走了好久，還沒有轉出這塊地方。大家看看天快亮了，還在敵占區里轉，都十分耽心少奇同志的安全，有些同志着急地嘟囔着：“怎么搞的，这么半天，還沒走出去！”“眼看天快亮了，被敵人發現了怎么办？”

少奇同志這時正站在一棵樹下，好像在沉思什麼，听着有人抱怨响導，就走過來對大家說：“你們不要抱怨响導同志，他負着很重的責任，找不到路，已經很着急，不要去攪亂他的信心，要讓他冷靜地去慢慢想辦法。”他又溫和地安慰响導同志：“不要着急，這一帶地方你很熟，仔細想想，會摸清方向，會找出路來的。”

少奇同志的話，安定了大家的情緒，就連响導同志緊蹙的眉頭也似乎舒展開來，他前進到三岔路口認真地去辨識着方向。在這時，我看見少奇同志仍然像往常一樣，靜靜地站在樹下，抽着烟，絲毫沒有焦急的樣子。

的确，自从和少奇同志行军以来，无论遇到了什么意外，从来没有看见少奇同志着急过、忧愁过。他总是异常镇静地鼓励我们，给我们以无比的信心和力量；他对每一个根据地护送我们的同志都是关怀的、信任的，经常让我们去问寒问暖，了解他们的要求，尊重他们的意见。他常常教导我们：“护送我们的同志，他们既了解情况，又和当地群众有密切的联系，他们的决定都是经过慎重考虑后才作出的，我们只有听从他们的安排，要我们怎样行动就怎样行动，你如果提出不同意见，或表示怀疑，那就很容易动摇他们的决心，这样反倒容易把事情办坏。如果万一他们布置有错误，那也必须在一定的场合，作为经验教训，适当地提出。”少奇同志就是这样地信任和尊重同志。

响导同志在少奇同志的安慰、鼓励和启示下，终于找到了一条小路，把我们顺利地带进山区——抗日游击区。

就是在这样险恶的场合，少奇同志也不允许任何人去侵犯群众利益。由于通夜的急行军，大家都渴得嗓子像冒烟一样，路过西瓜田边，勤杂同志就跑到田里，搞来几个西瓜给大家解渴。少奇同志立刻严肃地说：“你是不是真正关心群众的利益，就要看这种场合。我们现在还不是到了非搞几个西瓜来解渴就不能把革命力量保存下来的地步。”饲养员爱惜牲口，休息下来时，就讓牲口吃路边的庄稼。少奇同志看到，就恳切地告诫他们说：“随时随地，都应该有一分关心群众利益的心事！老百姓辛辛苦苦的庄稼，讓牲口随便一吃，就会损失一家几口人的一顿粮食。”

三

在去鲁南的路上，要渡两条大河——淮河和沂河。这两条河是平行的，都是从北到南。两河之间的距离约有十华里。敌人在两河沿岸都设立了密集的据点，如果我们在两河之间被敌人发现，真是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少奇同志事先了解了这一情况，并且和负责护送我们的——五师第五独立旅旅长曾国华同志研究了渡河的部署。当天，曾国华同志分别派出几批负责干线的干部去侦察情况，准备渡船等渡河的布置，预定傍晚悄悄渡过淮河，黑夜偷渡沂河。

傍晚，曾国华同志领着我们渡过淮河，按预定路线向沂河奔去。行走到两河之间，忽然狂风呼啸，沉雷震耳，顷刻间天地一片漆黑，大雨像瓢泼似地洒下来。我们浑身全湿透了，每个人都关心少奇同志的身体，因他当时正患着肠胃病。少奇同志却根本没考虑到自己的身体，反而来关心每个人，特别是关心随行的女同志。

来到预定偷渡的沂河河边时，已经是黑夜了，倾盆大雨越下越大。曾国华同志仔细观察了一会，但并没发现事先派出去的侦察人员和布置的渡船；他虽然



抗日战争时期的少奇同志

是一个善于游击战尤其是善于夜战的能手，但这一次由于护送党内这样一位负责的同志，感到自己的责任十分重大，因而不免有些惊异和焦虑。加之少奇同志当时的身体不够好，在暴风雨中，大家都担心他会淋出病来。在这对面看不见人的黑夜的沉默中，少奇同志早已觉察出来大家的担心和曾国华同志的心情，他宽解大家说：“既然派去的侦察、联络人员和布置的渡船没到，也不要着急，只是我们不要让人发现和遭受突然袭击，可以先到河岸比较隐蔽的地方，等待和研究情况。”于是大家都到一家摆渡人的茅屋里去。

一个钟头过去了，大雨仍没有停止，派去侦察、联络的人和预先布置的船仍然没有踪影。曾国华同志分析这可能发生了意外；他并亲自随同便衣警卫、侦察人员到附近村子里了解情况，特别是河对岸敌人的动向。据老乡们说：“今天还没有发现沿河敌人有什么动静，像这样刮风下雨的天气，伪军们很少单独出来，但是日本鬼子却在这样的夜里，和我们渡河的同志开过火。”他根据情况进行了判断，认为像这样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大雨天，对我们过河是有利的；但是日本鬼子为防止我们利用雨天黑夜偷渡，也有可能埋伏。因此，到底渡河还是不渡，他觉得是个大难题，于是就向少奇同志提出自己看法和意见，并批评自己的布置不够周密。少奇同志认真地听了曾国华同志的汇报后，没有丝毫焦急，也没有对曾国华同志

有任何實難，反而給以安慰。他稍稍思索了一下，然後說：“我對情況毫無了解，究竟怎樣行動，還要請你作決定。根據你所講的情況，這裡是敵人一個重要的口子，偵察聯絡人員又沒有消息，預先布置的渡船也沒到來。我們在這樣的夜晚也出動過，敵人過去也有這個經驗，目前又正是夏收的季節，敵我對糧食的鬥爭正是劇烈的時期，同時，我們白天經過的地方，有些是市鎮，也有可能走漏消息。當然也可能完全沒有問題。但是，我們要从最壞的情況估計出發。毛主席常常講：我們从最壞的情況估計出發沒有坏处。”接着又說：“過不過河還是請你決定，不過在這個地方，不宜待得過長。如果不強渡，就應該考慮是否轉移到沱河東岸。”

經過少奇同志這樣明智的分析，曾國華同志心里有了底，他決定轉移到沱河以東。當夜，我們都用急行軍的步伐，向東轉進。

第二天夜間，我們再一次渡過沱河和沂河，脫離了險境。後來曾國華同志得到情報：據說就在我們準備渡沂河的那個大雨天的夜里，敵人在對岸渡口附近設了埋伏。如果當夜強渡過去，就會受到難以想象的損失。少奇同志的判斷是多麼英明啊！

四

十一月，我們从北方局和十八集團軍總部，越過了敵人嚴密封鎖的白晉鐵路和白晉公路，到了太岳區陳庚同志的司令部。从太岳區到晉西北，中間有二百多里寬的沱河沿岸的大平川地，是敵占區。日寇沿著同蒲鐵路、沱河和太汾公路，布置了異常复杂的三道封鎖綫，來分割我晉東南和晉西北兩大抗日民主根據地，并企圖以此來隔斷我黨中央——延安和各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聯繫。越過這樣的平川地，只能黑夜行動；但是無論如何一個夜晚是走不過去的。因此，我平遙游擊隊在敵占區布下兩個地下據點：大小良庄。

當時，正值敵人集中五六萬日軍，“掃蕩”我太岳根據地，我們在太岳區隨同部隊進行了一個時期的反掃蕩鬥爭。在反掃蕩鬥爭中，負責守衛的是軍區參謀長畢占云同志。反掃蕩中期，少奇同志听取了畢占云同志的彙報，和大家研究了情況後，便決定趁敵軍仍在舉掃蕩的時候，從敵人後面穿過去。這是個有利的空子，同時把我們這一批人送出去，也可以減輕軍區在反掃蕩中的負擔。畢占云同志一方面完全了解這個指示的正確，一方面又敢心這樣行動太艱苦，怕少奇同志身體吃不消。少奇同志說：“革命本來就是艱苦的，特別是在敵後反掃蕩鬥爭中，我們全党全軍誰不是在極端艱苦的鬥爭中過日子，不要把我看得特殊！”畢占云同志和我們大家听了少奇同志的話，心里又是感激，又增加了無限的勇氣和決心。

我們出發了。敵人在山下燒殺搶掠，我們从山上

走；敵人在前村掃蕩，我們在後村煮飯，等到敵人準備向後村搜索時，我們却吃完了飯，又轉到他們屁股後面。這樣的行軍生活，真是既緊張又机智和主動。

某日，我們在傍晚从山區下到大平川地，从平遙城北五里地的一個口子，越過同蒲鐵路，渡過沱河。當夜行軍一百六七十裡，黎明前抵達大良庄，隱蔽下來。护送我們的平遙县委书记和他們的武工隊。县委书记預先和晉西北三分區司令員楊秀山同志聯系好，要他派幾個團來接少奇同志，并派聯絡參謀到預定地點聯系。晚上，我們按照預定的行動計劃，从大良庄前進到距太汾路上賢庄五里地的一座古廟里，等候三分區聯絡參謀到來，然後即以急行軍越過太汾路。到了荒涼的古廟旁邊，我們停止前進，等候聯絡參謀，和了解上賢庄一帶的動靜。一直等到半夜，却不見一個人影，臨時派去的偵察兵回來報告，上賢庄的前後左右都像死一樣的沉寂。县委书记發了愁，不知道三分區的部隊是否按預定時間到達一定地點，如果軍隊按預定部署到達，我們不就此過路，在這兒繼續等下去，反而會暴露目標，這兒又是敵占中心地區；如果冒冒失失地過路，萬一分區因臨時情況，沒能派出部隊來，又將冒極大的危險。在這種情況下，他向少奇同志作了彙報和請示。少奇同志問我們大家的意見怎樣，有的同志當即說：“古廟高敵人據點上賢庄只五里，如果敵人有行動，上賢庄必然免不了有人聲、狗叫，可是現在沒有半點動靜，可見敵人還沒有行動。”有的同志說：“我們已經走到這兒了，再返回大良庄，也很可能暴露目標，此外又沒有比較可靠的隱蔽地方。”少奇同志依舊像他慣常那樣慈祥地對县委书记說：“你是了解情況的，又是和群眾有聯繫的，我們對這兒的情況完全無知，因此，還是要你下決心。聯絡參謀沒來，可能是派的部隊還沒到達。據我們了解，敵人对三分區的活動較為頻繁，反反復復地實行了極端殘酷野蠻的‘三光政策’。三分區臨時遇到什麼情況也是可能的。我們經過了這麼長的敵占區，很難保證不走漏消息。”接着他又分析了當時的具體情況：“敵人如果有埋伏，他也不會哇哇叫，引起人聲和狗叫；老百姓看到日本鬼子來了，也可能都躲在家里不出來。因此沒有發現什麼聲息和動靜，不能就得出沒有敵人埋伏的判斷。我以為還是按照原來預定的步驟行動好一些。可以回大良庄去，現在到處都是一望無際的青紗帳，再隱蔽一天是可以的。”講到這里，他略停頓了一會，又非常謙和地望著县委书记的眼睛說：“你只把我的意見作為參考，不要動搖你的決心。在這里，我們是服从你的。”這時候，我們看到县委书记黑黑的臉膛上，泛起一層紅暈，一雙明亮的眼睛里，閃着晶瑩的淚光，少奇同志對他的信賴和尊重，顯然使他深受感動。

當夜我們返回了大良庄，第二天又去偵察，沒發

有什么动静，少奇同志决定：当夜即越过太汾公路。第二天拂晓，我们顺利地到达了三分区，和楊秀山司令率领的部队会合了。看到了自己的部队，少奇同志的脸上立刻浮现出亲切的笑意。楊秀山同志向少奇同志汇报情况，并说：“据侦察报告：您到达古庙的前一天晚上，有一百八十多个敌军，在上賢庄埋伏了一夜，他们传说是朱总司令要经过这里。第二天拂晓就撤走了。”少奇同志听了以后笑着说：“我们是马列主义，敌人是资本主义，和我们捉迷藏，他总是要输的！”

五

我们进入晋西北地区，已是严寒的十二月，这儿山高风大，满目是冰雪世界。我们还要通过回到延安的最后一道封锁线。日寇为分割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联络，战车和坦克昼夜不停地轮流在交离公路上往来巡逻。因此我们还须在这样严寒的天气里夜行军。三分区和地委的同志，敢心少奇同志的身体抵不住那样的严寒。少奇同志不在意地说：“三分区和晋西北军区的部队和群众，不都是常常夜间活动么？你们都能顶得住，我们为什么不能克服这种困难呢？”

在交离公路西侧的平川地，需要从夹着冰雪的河流中淌过。离开平川地进入了高寒的山区，迎面吹来的北风，真比刀割还难受。北风吹到脸上，每个人的眉毛和男同志的胡子上都结了冰珠子；爬山时不断流出的热汗浸透了衣服，被冷风一吹，变得像玻璃一样，一走就刷刷啦啦地响。而且在这高寒的山上，没有村落和住户，我们感到身上很冷，口和肚里又渴又饿，嗓子和鼻孔干得像要冒烟了，那种味道真不好受。

在这种人人都感到难受的情况下，少奇同志仍然像他惯常一样，兴趣盎然地给大家讲故事，他说：“前面那座很高的山，就是吕梁山，山上有个人祖庙，我也上去过；庙中有历代的碑记，说人类的祖先就是从这里起源的……那当然只是一种传说，你们将来有机会也可以上去看看。”大家被这样新鲜的故事所吸引，就都忘却了寒冷、饥饿。女同志都听得格格地笑，一边听着一边鼓着劲走，就这样过了高寒山区。

这时少奇同志一边抹去了眉毛上的冰凌，一边幽默地说：“中国什么地方的气候，都是比较好的，最冷的地方也不至于使人的血液流不动。”尽管他自己也冷，也疲倦和饥饿，可是他总是充满了胜利的信心，总是鼓舞着大家不断地前进。就这样，我们在经历过一年的夜行军生活，经历了各种艰险以后，终于跟随我们敬爱的少奇同志，于十二月底平安地返回了革命圣地——延安，看到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在一起了。

致 讀 者

最近我們接到一些基層團組織來信，反映本刊有關紀念“五四”運動四十周年的宣傳，受到廣大青年的歡迎。過去沒有訂閱“中國青年”的青年，都踊躍預訂了。如江西金溪中學團总支樂智來信說：他們那里不到一小時，就有453人訂了“中國青年”。訂閱本刊的費用是由勤工儉學得來的錢解決的。讀者這樣熱愛“中國青年”使我們受到了很大的鼓舞，今後我們一定要進一步改進本刊的宣傳。

現在正是各地郵局收訂第三季度報刊的月份，請讀者注意當地郵局收訂日期。

——編者

(上接第36頁)

有病的工農勞動人民有什麼不好呢？再說，我們的衣食住行，哪一項不是工人農民創造的，他們不也是在侍候我們嗎？只可惜我們侍候他們還沒有像工人農民勤勤懇懇生產東西來侍候我們那樣周到和圓滿。世界上只有一種人不侍候人而專接受人家的侍候，那就是剝削階級。

我多次地說過不要輕視護士工作，因為在醫療過程中，醫生、護士、藥劑、化驗等人員是一個協作的整體。共同擔任保障人民健康的工作，只有分工的差別，沒有社會地位高下之分。在我們國家里，榮譽可以用勞動來爭取，並沒有特定的榮譽職業。前面舉出的幾個護士同志就是在平凡的工作中作出了不平凡的成績，而享有崇高的榮譽。看起來那些認為自己的工作太平凡的同志，倒並不是他們真正具有什麼高尚的思想，相反的，是他的個人主義思想與那些大公無私舍己為群的先進人物比較起來，確是有些太平庸得不足道了。

青年是處在一個成長的時期，他們的體、政治思想、生產知識都正在成長。農作物的成長需要雨水和肥料，青年的成長需要黨的教養和自己的積極學習、艱苦鍛煉。

我深切地希望，青年醫務工作者，在黨的教養下，以革命的思想，又紅又專的步伐，奮發沖天的干劲，在醫務戰線上創造惊天動地的成績，大大地超過我們老年一代。這也是我們引以為慰和寄予厚望的事。

医务工作者和病人之間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副部长 傅連璋

两种不同医务工作者与病人的关系

我是一个医生。在革命的队伍里，三十多年来我深切地体会到，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的愉快。当我与一个治愈的患者告别时，我和病人同样地感到无比的欢悦。我常收到一些陌生的人的来信，从那些热情洋溢的信上，知道他们曾经是我治过的病人。有时，我也碰到一些不知名的人来与我握手言欢，从他们的自述中，才知道我曾经为他们治过病。

医务工作者与病人的关系，是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大凡人与人的关系必然要反映出一种政治关系。革命的队伍里，我们与伤病员之間，存在着一种革命的友谊。我们对待伤病员，不论他是张三、李四，不论他的病情多重，有无救治的可能，首先是寄予他们以极大的同情。在战场上，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也不能扔下一个伤员，尽管条件如何简陋，也不放棄拯救一个病人的最后时刻，因为伤病员是我们革命的战友和阶级弟兄。

在旧社会里，医务工作被当着铁饭碗，或者金饭碗，医务工作者与病人的关系，往往反映为一种金钱交易的关系。除此而外，也有这样一种医务工作者，他们对待病人，从某种个人的目的出发，看这个病人有没有研究的价值，能否从这个病人身上学到一种新的手术。为了个人研究、写论文和攫取名利，不惜拖延治疗，或者给予不恰当的治疗；为了练习某种手术，也不考虑患者的安危，把病人的健康作为代价来追求个人的名利，谈不上为病人服务。还有一种见病不见人的态度，就是把病人当作一个机械的工作对象，只看到疾病的特殊性，而没有看到人的特殊性，什么病给什么药，千篇一律，办完了事，不去研究每个人的思想情况和其他条件，如何因人制宜地、更细致地进行工作，对病人常是冷冷冰冰，缺乏热情。

应该说许多旧社会的医务工作者，对于有钱的统治阶级，还是服务周到的，所谓见病不见人，说得更透些，就是不能很好地为劳苦的工农病人服务。因此，革命队伍和旧社会里的两种不同的医务工作者与病人的关系——热爱病人，和不关心病人疾苦，归根结蒂，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种医疗作风的反映。

树立社会主义全新的医疗作风

两种不同的医疗作风，给我们今天人民的医疗机构，带来了两种不同的影响。

青年医务工作者，是老年一代的接班人，无疑的应该绝对摒棄某些旧的不良的传统，而继承革命医务工作者的优良传统，并加以发扬光大。

医务工作者的革命传统，就是党和毛主席所教导我们的：“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就是热爱伤病员，全心全意为伤病员服务。

如前所述，革命的医务工作者，在党的教导下，懂得了伤病员是自己的革命战友和阶级弟兄，因而他们与伤病员之間，有着血肉相连，痛痒相关的感情。他们也懂得治好一个战士，是增加一分打击敌人的力量，治好一个工人或农民，是給生产战线輸送一个劳动能手，把伤病员早一天治好，就是对于革命多作了一分贡献。这样，医务工作者把自己的工作，自然地当着革命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要对病人有利的事，都努力去办，从没有考虑到这项工作是否高尚或者繁瑣。因为誰也不会认为革命是一件平凡而轻松的事。

在革命战争中，医务工作者要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抬担架或者背着伤员下火线；除了包扎治疗工作而外，有时还要为伤病员洗澡、洗衣服，或者作饭吃，还要去安慰他们，鼓舞他们与伤病作斗争的信心。在紧急的情况下，为了保护伤员，医务人员就拿起武器，坚守在阵地上，许多同志甚至献出了自己青春的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位团卫生队长解艺民同志，在一次战役中，亲到阵地，抢救伤员。当他最后一次冲到敌人火力集中的铁丝网边，救出重伤的团政委时，自己已经中了三处弹伤。他背着政委爬行了五十分钟，到达前线的包扎站，由于医务人员太少，又坚持着为伤员们包扎，而自己的伤口却不断地向外流着鲜血。这时敌人的兵力占了优势，必须紧急撤退，解艺民同志指挥着担架抬走一个伤员。有人看到他的伤势也很重，劝他乘着担架撤下去，而他以作为一个卫生队长崇高的革命责任感，坚持着看到撤

走每一个人，看到繃扎站抬走了最后一付担架。这时解艺民已经由于流血过多，昏倒在血泊之中。敌人扑到了繃扎站，他膝胸中看到一个鬼子向他身边走来，愤怒的火焰，燃起了他最后的一点生命力，他蓦地挣起来，一枪把鬼子打倒了。这时另一个鬼子又向他猛扑过来，他又拼着与鬼子在地上搏斗，终因精力耗尽而英勇地牺牲了。

解艺民这种为了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保衛伤病員的健康而不畏牺牲的英勇精神，是成千上万革命队伍里医务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救死扶伤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的传统，在解放以来，医务战线上有了许多新的体现，并且已经涌现出了许多新的先进人物。河南有一位护士史素霞，用自己的嘴去吮吸乳腺炎病人含有细菌的乳汁，用自己的手去为便秘的病人掏大便。某陆军医院护士安德厚，护理一个结核性脑膜炎后遗症的患者。这个病人入院时已经下肢瘫痪，大小便失禁，两个臀部有严重的褥疮，很多人看来是没有希望的了。而安德厚同志却十分同情病人，不厌其烦地采用各种办法：多变换体位，注意保持创面潔淨，勤查大小便，更换垫布，不使创面污染，以及在创面上施以热刺激改善局部循环促进肉芽生长等，竭尽一切力量来争取病人的痊愈。问题不在于这些方法有什么巧妙，可贵的是，他能够把这些看来是十分繁琐、对于一个几乎絕望的患者奏效又是如此緩慢的措施，始終如一地坚持下去。在治疗的同时他又不断地給患者以安慰和鼓励，使患者的精神状况和营养状况逐步好转。终于几个月以后，这个一垂危的病人，竟然恢复了健康。这个事例就是一种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精神的体现。

许多先进的人物和事迹，是不胜枚举的，而抢救丘财康的事件，又是集中地反映了我們社会主义祖国新的医疗作风和工作方法的光辉范例。这一个奇迹的创造，首要因素是党的领导，政治挂帅。由于党的教导，医务人员觉悟到挽救一个工人战士生命的神聖职责，因而破除了对资本主义国家医学权威的迷信，想尽了一切办法来克服困难。许多专家，打破了門戶之见而通力合作；许多工厂，帮助赶制一切急需的器械。当治疗需要輸血或者植皮时，人們就迅速地排满了长长一列报名的队伍。一个工人的生命健康，得到如此最大的重视，动员了如此巨大的群众力量，誰說不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才能做得到呢！所以这一場战斗的胜利，也是我們社会主义祖国新的医疗作风和工作方法的胜利。

我們医务战线上，新鲜的事物越来越多了，医院訂立了许多便利於病人的新制度。医务人员走出了医院大門，輪流下乡下厂，把医藥支援到生产最前綫。现在还流行着很多口号，如：“一切为了病人”、“政治下病房”、“医藥送上门”、“无痛医院”等等。问题不

在于这些口号是否完整，也不在于无痛医院是否真的做到100%的无痛，而可喜的是这一切都反映了医务工作者全心全意为病人打算，使医疗工作更好地为生产服务的新气象。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全新的医疗作风和工作方法，正在迅速地生长，生根，和普遍开花。

当然还应该看到，那些不关心病人疾苦患病不見人的旧的医疗作风，在我們中間还存在有相当的影响，新的医疗作风还树立得不够巩固。破旧立新，往往是一个反复复杂的过程。有这样的一些同志，曾經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医疗队，或者下乡下厂支援除害灭病，的确表现了很大的革命热情，为人民立下了功劳。在他回到原单位之初，也确有一番抱負，希望把这种新的精神，貫徹到日常工作中去。但是时间长了，这种热气就漸漸的消沉下来，重新按照医院的老常规办事了。这就說明新的事物的出現，如果不積極地培植它，去改造旧的某些落后的传统，則这种幼嫩的新苗又会有淹沒的危险。

青年人要有欣欣向荣的朝气，要有敢做前人所不敢做的事的气魄。我希望青年医务工作者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支勇于革新的先鋒和突击力量，以你們的模范行动，带动群众，高举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大旗，讓搶救丘财康的精神遍地开花，放出更大的异彩。

全新的人才能做出全新的事

什么花結什么果，全新的人才能做全新的事。不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就不会出色；沒有工人阶级立場和热爱劳动人民的感情，就不会有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和医疗作风；沒有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就不会把革命的工作干好。

许多先进的人物，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把革命的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只要与革命有利，与挽救自己的阶级弟兄的生命和健康有利，就不怕脏，不怕臭，不怕劳，不怕累，在必要时，为着革命也不惜貢獻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就叫做革命的人生观。我們今天革命的胜利，正是有千千万万（有名的和无名的）具有这种革命人生观的先进人物，前仆后继，英勇斗争所得来的。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事业是一个規模更为巨大的革命任务，需要更多的这种大公无私舍己为群的具有革命人生观的人投入到新的斗争中去，以争取更大的胜利。对于青年來說，这正是前程似錦大有可为的时代。

不幸的是，青年医务工作者中，还有一些人，看不見偉大的革命远景，而斤斤計較眼前的个人得失，輕視自己的职业，認為是太平凡了，做侍候人的事，因而不安工作。

如果說医务工作是侍候人的工作，也可以。侍候

（下轉第84頁）

光荣归于党和祖国

第二十五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子单打冠军 容国团

我所以能够在这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中取得男子单打冠军，是由于党对我的培养和教育的结果。从我的生活经历中也可以说明这个真理。

我是广东中山县人，自幼生长在香港。我十二、三岁在学校念书时，就对打乒乓球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但是在香港这样黑暗的社会，像我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父亲是个失业的海员，母亲是个家庭妇女，一家人温饱都顾不得，怎能谈得上发展兴趣的问题。在我十六岁那年，我被生活所逼，离开了学校出来做工。那时，一家鱼市场的投机商人看中我会打球，就收留我在市场工作，要我每天在辛苦的工作之后，到他开设的康乐馆为他打球赚钱。为了一家人的生活，为了有机会打球，我不得不忍受痛苦替资本家卖命。

饱尝黑暗的人，特别盼望光明。一九五四年以后，我每年总有机会回到广东。每当回国一次，我便感到祖国又迈进了一步，让我更向往祖国。一九五六年国庆节，我荣幸地参加了港澳回国观光团来到祖国的首都参加国庆观礼，这是给了我一次最深刻的教育。滚滚的人流涌向天安门，涌向毛主席，强大的解放军队伍，工农业的伟大成就，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欢腾的景象……使我多么受感动！特别是看到健壮的体育大队，听到了响亮的“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声音，我的心像要沸腾起来。我暗暗想着：要是能够成为这个队伍中的一员，该是多么幸福呀！

一九五七年九月，我随香港乒乓球队再次来到北京。以后又上到

海、杭州等地参观游览。一路上，伟大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的图景把我吸引住了，而祖国体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更加使我欢欣鼓舞。这次，我下了决心：回来，一定要投到我亲爱的祖国的怀抱，参加到伟大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列中去！

在这一年的十一月间，我终于从香港回到了广州。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开始，怎么能不使我心情激动呢！

剥削和压榨摧残了我的身体，使我带着肺病回到祖国。我一回来，组织上就花了很大力量为我治病。在这期间，广州市体委主任陈运交同志和广州体育学院党委第一书记廖志华同志常来看我，他们十分关心我的身体健康，安慰我要好好休养。在祖国人民慈母般的关怀和照顾下，我很快就恢复了健康。

我病好了，正式开始在广州体育学院学习，老师和同学都热情地关心我。我还记得住进宿舍的第一天，同宿舍的同学的举动使我感动得快要流泪。这个宿舍里共有四张床铺，三张是弹簧床，一张是木板床。原先已有三个同学住在这里，他们三人分别睡三张弹簧床。我是后来的，理当睡木板，但是三个同学看到我身体不怎么好，他们都争着把弹簧床让我睡，自己拉着去睡木板床。这虽然是一件生活小事，但使我感慨万端。我享受到祖国的温暖，感到在我们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多么亲密、友爱、团结。同香港比起来，真是两个世界，两种人生。在香港，社会上充满着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想到这里，我不禁记起了鱼市场的老板。他们为了赚钱，把我当作工

具，我要是乒乓球打赢了能替他们出名，他们就高兴的五体投地。要是打输了，他们马上翻脸。一九五四年还发生过这样的事情，这年的国庆节，我参加了香港工会联合会为庆祝祖国国庆而举办的乒乓球表演赛。老板知道后竟逼我写“悔过书”。我认为我能参加庆祝祖国的国庆活动，这是我的光荣和自豪，没有什么值得悔过的。这样，我就被开除了。后来，由于进步工会组织的帮助，我才重新找到了工作。现在，当我一踏上祖国的土地，祖国人民不但给我安排了舒适的学习环境，还在生活等方面对我无微不至的关怀，这怎能不使我受到感动？！

党和祖国不仅在学习上和生活上关心我，也在政治思想上帮助我进步。我到广州后，正赶上伟大的整风运动。开始，我一方面觉得新鲜，另一方面也不很习惯。但在党的教育下，我很快就认识到整风运动的伟大意义，并且积极投入这个运动，和同学们一起写大字报，参加辩论会。从前，我认为个人英雄主义可以刺激技术的提高，同时相信“球运”可以决定胜负。通过整风学习，我认识到这些想法实质上是个人主义和唯心主义，而要做一个新中国的优秀运动员，就必须树立起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思想和具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又红又专，勤学苦练，这样才有可能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通过了这次整风学习，我明确了个人努力方向，这给我以后不断提高技术打下了思想基础。

我回到祖国时间虽然不久，但思想觉悟在不断提高，我决心刻苦学习，提高技术，准备为祖国贡献



周总理和容国团亲切地谈话。

出自己的力量。但是，在我开始技术锻炼以前，我的最大困难是体质差。这是一个关键问题，因为没有身体基础，就谈不上进行技术训练。事实也是如此，我因为身体弱，打起球来很吃力，比赛时，往往打到第三局，就两腿无力，手也发软。遇这样的身体条件是很难指望能参加世界性的比赛的。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加紧锻炼身体，增强体质。于是我每天坚持不懈地锻炼身体。因为我病刚好不久，开始跑四百公尺就很吃力，呼吸困难，两腿酸痛。为了达到已定的目标，我还是咬紧牙关克服困难，日复一日地锻炼着，两圈、三圈，直到现在，跑三、五千公尺已习以为常了，并且能够顺利地跑完一万公尺。为了使身体得到全面发展，在练长跑的同时，我还练习举重、跳绳、拉力等项目。由于体力的迅速增加，就保证了我在这次世界锦标赛中，能够坚持连续几天的紧张战斗。

在进行体力锻炼的同时，我在技术方面也加紧了训练。我常想，一个优秀的运动员，应该具备多种

多样的技术，因为参加比赛时，什么样的对手都可能遇到，如果技术发展不全面，就不可能根据不同的对手来改变自己的战术。因此，我平时比较注意从这方面去努力。但是要全面地锻炼自己，确实有不少困难，比如在练球过程中，练攻球时，过了段一时间，守球技术可能会有些下

降；练守球时，攻球力量又差些。又如练反手抽球，正手抽球就可能受到一些影响。如何进行全面锻炼，把自己培养成为一个多面手，是要有勤学苦练的精神的。要能够做到勤学苦练，就需要有顽强的战斗意志。在锻炼过程中，我也有意地注意这个问题。有时候，锻炼了身体，又要进行技术训练，的确很疲劳，也很想歇一歇，但是又想到了为了更快地提高技术水平，我也就坚持练习。领导上提出“平时多流一些汗，比赛少输一个球”的口号对我也有很大的启示，我想，将来为祖国争得荣誉，现在刻苦磨练是完全值得的。除自己下功夫锻炼外，我还注意学习别人的优点和总结自己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在国际比赛中，我觉得值得学习的经验更多。比如这次和西多争夺冠军赛，第一局我输了，我就比较认真地总结自己失败的原因，同时也注意分析对方的特点，然后运用长短球兼施，并在猛攻时用突然来个像是放短球的假动作而实际上是扣杀的動作来扰乱对方。

党的教育、教师的指导和同志

们的帮助，使我在回国不到二年中，从思想上到技术上都有了提高，特别是我在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光荣地参加了共青团以后，新的政治生命的开始，更激发了我的政治热情，我怀着为祖国为人民立功的决心去迎接这次的世界锦标赛。

在这次比赛中，我所以能够闯过七关，击败重重劲敌，取得世界冠军的称号，是祖国和人民给了我力量，是全队的同志给我的帮助和鼓励，这是获得胜利的源泉。特别是在第七轮与美国队的迈耳斯争夺决赛权和最后一轮与匈牙利队的西多争夺冠军赛时，更是得到全队战友的帮助。迈耳斯是美国多次冠军获得者，经验丰富。开始战迈耳斯时，我处于不利地位，前三局我输了两局，打第四局时又是他以十比六领先。在这种情况下，我有点紧张，但是又想到这时中国队争夺决赛权的只剩下我一人了，于是我便鼓励自己要沉着应战，要有胜利的信心，决不让美国人闯过这一关。这时候我什么也不想，只抱定一个决心：一定要战胜他，为祖国立功。最后，终于以三比二打败了这个老练的对手，为取得争夺世界冠军决赛权扫清了前进道路上的最后一个障碍。

最后一轮对手是西多。西多是身经百战，并且曾经九次获得世界冠军称号的老将。对手是不可忽视的，因此，在这轮比赛前，全队同志都帮助我共谋计策，研究战术。比赛一开始，我就展开激烈的进攻，运用拉左杀右和发球抢攻的战术，一度曾以七比三领先。这时，西多加强反攻连连得分，以致我失了头一局。在这个紧急关头，全队的同志帮助我总结了这局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对付对方的办法。打第二局时，我就改变战术，加强拉球力量，并且注意西多的反攻，才赢得了这一局。第三局我竭力保持冷静，沉着应战。因此，又得胜了。打第四局时我的信心强了，运用拉、扣、搓、吊的技术，经过了一

(下转第22页)



人生最大的快乐是什么？

——學習向秀麗要解決的一個根本問題

自從向秀麗光榮犧牲的事蹟在報刊上發表以後，引起了各地青年的強烈反應。全國很多地區的工廠、機關、學校都掀起了學習向秀麗的熱潮。很多青年在給編輯部的來信中，都談到向秀麗的高尚品質所給予他們的激勵和教育，並表示要認真學習向秀麗全心全意為人民的群眾。但是也有部分青年在來信中提出了一些問題，如：為什麼說一個人生活最大的價值是全心全意為群眾，這樣生活有什麼意義？為了別人，個人犧牲點東西，是痛苦，還是樂事？像向秀麗這樣為了搶救一些公共財物而犧牲了生命是否有些得不償失？這些都是關聯到對人生的看法問題。英雄人物的事蹟學習過了，但這些帶根本性的問題恐怕並不是所有的青年都已經認識清楚的。現在我們把黃里同志給編輯部的一封信發表出來，希望青年讀者們共同討論。討論稿可以寫自己的看法，也可以結合現實生活中的事例談自己的體會。參加討論的稿件，請在信封上註明“大家談”，並請自留底稿。

——編者

編輯同志：

我是一個在新社會成長起來的青年，參加青年團已有好幾年了，一直受著黨的撫養教育。特別是經過整風運動以後，深感到在今天這個偉大的時代里，生活愈來愈迫切地要求我們徹底淨地清除一切個人主義的醜惡思想。我也曾多次下過決心，嚴格要求自己，但由於共產主義人生觀未能真正樹立，幾年來進步始終非常緩慢。不久前，機關里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學習向秀麗的活動，我們都為向秀麗這種舍己為群的英雄行為所深深感動。在學習討論中，許多同志都說：一個人生活的最大價值，就在於他能為更多的人（人民群眾）生活得更好而活著。正因為如此，在必要時他也能為更多的人更好地活著而犧牲自己。學習後，大家都紛紛表示，要把向秀麗這種崇高的精神貫穿到我們日常生活中去，隨時隨地都要把集體利益放在前面，要把全心全意為集體謀福利看作是人生最大的快事。這個問題我思考了很久，還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究竟為什麼一個人只有全心全意為集體、為他人才算生活得有意義，才是人生最大的愉快？從我個人日常生活中体会到，如果更多地為集體，就往往要犧牲一些個人的利益。譬如，要多爭取參加義務勞動或是多搞一些社會工作，就必然要

犧牲個人一些休息時間；要主動地多關心同志們的冷暖飢飽和疾苦，就必然要影響到對自己的照顧；有時領導上多交了一些工作給我，我就感到這是額外負擔。當然，這些事必要時還得作，儘管有時我也這樣作了，但由於對個人利益既有所犧牲，作的時候，從內心講，就難免有些勉強和不舒暢，又怎能說這是愉快的事呢？我還想：有些革命老幹部和積極分子，他們終日勤勤懇懇，忙忙碌碌，席不暇暖，食不甘飴，有好處首先讓給別人，有困難自己承擔……而且這樣的行為，又不是偶爾為之，而是成為生活的常規，這樣生活下去，難道他們都是怡然自得嗎？當然，像那種損人利己、把自己幸福建立在別人痛苦上的人，是很卑鄙的，我也痛恨那種人。但是我又想，如果只要大家都不要剝削別人，誰也不占誰的便宜，但也不必為別人犧牲自己的利益，各人付出足以換取自己生活需要的勞動。這樣，我們都為集體作了事，也都從中取得了自己應得的一份，從表面上看是人人為自己，實際上確是人人為大家，這不是也很好嗎？有什麼不對？同時，我還想：向秀麗、羅盛教等英雄，為了搶救某個人，搶救某些公共財物而不惜犧牲了生命，是否完全值得？是不是對人民真正有利？一個人的生命無論如何應該珍貴，尤其

是這些舍己為人的英雄，肯定已經具有了先進思想和高尚的品質，在黨的教育下，他（她）一定會繼續進步，如果不犧牲的話，將為人民做出多少貢獻；而被救活的人，當時或者以後是否會具有英雄那樣的先進思想和高尚品德呢？是否能彌補英雄的犧牲所給社會造成的損失呢？他們今後能否做出或超過這個英雄不犧牲時將能做到的貢獻？這都是個大問號。至於為搶救一些公共財物而犧牲了英雄的生命，喪失了人民最寶貴的財產——忠實的“同鄉”，這就更不合算了。人是最寶貴的財產，生命只有一次而已，物質財富損失了可以再造，人死了就不能復活，正如俗語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我總懷疑這樣的犧牲究竟有多大價值？是否有些得不償失呢？假如向秀麗當時也竭盡一切力量去救火，只是並不以自己的身體去阻擋火，或者在受傷以後及時退下來，既已積極地參加了救火，也不至於犧牲生命，這樣又有什麼不對呢？許多人都不都是那樣作的嗎？

的確，為了這些不能解決的問題，我深為煩惱。我想這恐怕還是屬於人生觀的問題吧？！但這種人生觀究竟錯誤在哪裡？我是多少迫切地等待著你們幫我解答啊！

黃里

舍己救人的廖灿贵

中共四川仪陇县马鞍山区委

林伯余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鷄剛叫頭遍，四川仪陇县文昌乡人民公社基建队的二百多名队员，就已经来到筑路工地上。

年青的中队长廖灿贵同志，这天显得特别忙碌。他是在拉石滚组负责掌前舵的，可是只要有点空隙，他总要到各组检查一下工程的进度，同志们安全，和工程质量。他叫大家休息，自己却连着干；他要大家注意安全，自己总是带头做最危险的工作。上午，大家利用休息时间，进一步讨论了今天的奋斗目标。拉石滚组乘机以午饭前来回拉两趟为条件，向各组发起友谊竞赛。接着，各组纷纷响应。运石的保证充分供应石头；挑土的做到泥土够用；铺碎石的力争铺得又匀又快。为了更合理的安排劳动力，廖灿贵同志又和大家商量如何节省人力？经过讨论，大家认为石滚虽然有三千斤重，但这里坡度既不高，也不长，可以腾出八个人去支援其他组，把原来的三十八人减少到三十人。廖灿贵同志把人力重新安排了一下，左右各用十四人拉缆绳，后舵由石工墨师蒙掌握，他自己掌握危险性最大的前舵。上班时间还没有到，廖灿贵同志就已经掌好前舵准备干了。队员们见中队长已先动手，就都跟着一起干起来。可是石滚由于休息时停下来，现在已陷入泥路一寸深，三十个人猛的用力一拉，把石滚拉斜了，石滚失去了平衡。在石滚前面两公尺远的地方，有一道漩涡，漩涡下面是一条曲折的坡路。石滚刚被

拉过漩涡，就向倾斜地带左侧猛滚下去了。靠岩边一排拉绳的十四名队员，看着石滚向自己飞快地滚来，焦急万分。他们的下面是一段约十公尺高的陡岩，如果全部往岩下跳，那么人还未接触地面，石滚就有压到他们头上的危险，要是向前后退让，前面是石滚所向的地方，不能去，后面的路已被石滚占去了一大半，也无法后退。廖灿贵同志因为站的位置是在石滚中间，由于石滚向左侧岩下滚去，他只要向右边走几步，就不会有任何危险。但是当十四名队员处在进退两难，千钧一发之际，廖灿贵同志并没有这样做。他一心想的只是怎么把同志们救出险境。同志们只见他猛地将身子一横，用尽全身的力气把石滚的前舵向左边一搬，石滚旋即改变方向朝右面滚去，解除了左边十四名队员的生命危险。可是廖灿贵同志脚下新铺起来的路基下陷约二市尺长，他站立不稳，跌倒在路心，队员们来不及救他，石滚已从廖灿贵同志的身上横滚过去了。党的优秀儿子——廖灿贵同志，为了抢救十四名队员的生命，自己壮烈牺牲了。

廖灿贵同志为了家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生死关头，表现出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偶然的，是与他仇恨旧社会，热爱新社会，热爱党和人民分不开的。廖灿贵同志牺牲时才只有二十四岁。可是这短短的一生，只有从解放后他才过着人的生活。他出身于雇农家庭，父亲在解放前经常帮长工、打

短工、披星戴月，一年忙到头仍不能让妻儿得到温暖，后来还领着妻儿讨了几年饭，刚熬到临解放时就病死了。母亲的处境也很悲惨，活了四十多岁，不仅没吃过一顿饱饭，穿过一件好衣裳，而且在解放前还被恶霸地主逼得背乡离井，至今下落不明。灿贵同志在几家贫苦农民的帮助下，才熬到解放。解放以后，灿贵同志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培养下，很快成为一个有觉悟的青年。一九五〇年他当了村的武装队员，一九五四年光荣地加入了青年团，还被选为农业社的治安保卫主任。一九五八年乡里组织基建队，一开始他就担任第三中队中队长，工作任劳任怨，深受群众爱戴。在短短的半年基建工作中，被评为三次县的模范，七次乡的模范。灿贵同志自担任治安保卫工作以来，经他亲手破获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的破坏案件就有十多起。为了检举地主李运祥、李树人隐瞒和分散财产的罪行，他拒绝了他们的行贿；为了揭发坏分子周辉五的罪行，他一连十个晚上没有睡觉去进行侦察工作，终于逮住了这个坏分子。

廖灿贵同志牺牲了，但他的鲜血没有白流。现在，一条光滑平坦的幸福道路，已横贯仪陇县所属的二龙、文昌、三河三个公社。在这海拔二千公尺的高山深谷地带，当人们推着各式各样的车辆在这条公路上行走时，他们就赞美着这条道路，因为它给山区人民带来了幸福。

廖灿贵同志虽然牺牲了，可是他的舍己为人的共产主义品质，他的嫉恶如仇的斗争精神，他的任劳任怨的劳动态度，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最近，共青团仪陇县委已追认他为模范团员，并决定开展一个全县团员、青年学习廖灿贵的运动。

廖灿贵同志的精神将永远闪烁着光芒，永远活在我们心里。

F=1 2/4, 4/4

五四紀念歌

王戈清詞
时乐謀曲

五四 革命的风暴打断了奴求的鎖鏈，
五四 革命的火炬照亮了前進的方向，
我們中國青年
我們中國青年
勇敢堅定，不怕犧牲，熱愛祖國的鮮血在周身沸騰。
不怕艱險，不怕困難，祖國的遠景鼓舞我們向前。

同志們 這正是大顯身手的時候，要獻出最大的力量
同志們 這正是大顯身手的時候，要獻出最大的力量
春 發出燦烈的光芒，把一顆紅心獻給黨。
春 發出燦烈的光芒，把一顆紅心獻給黨。

(副歌)

五四的光輝 永遠不滅，五四的精神 永遠發揚，快
踏上時代的駿馬 向彩霞般的遠景 飞翔 飞翔！



1919—1959

尹大生作

继承五四革命传统 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尖兵